

#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2

1 9 7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 教育革命 ·

请看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江 云( 1 )

十月革命到三十年代的苏联教育史

……………〔苏〕O·Д·克金克拉泽( 6 )

工人阶级参与苏维埃国民教育体制的创建

……………〔苏〕B·A·腊祖莫夫( 30 )

学校的根本缺点……………〔苏〕A·O·布勃诺夫( 40 )

### · 抗日战争时期的投降主义 ·

中国事变的回忆……………〔日〕今井武夫( 44 )

### · 世界农业 ·

农业的变化……………〔美〕D·盖尔·约翰逊( 77 )

重建美国农业……………〔美〕盖伊·霍尔沃森( 93 )

战后日本农业被摧残的过程……………〔日〕《人民之星》报( 99 )

全世界会有足够的粮食……………〔美〕约翰森( 109 )

瑞典实行抑制通货膨胀的农业政策

..... [美] 马歇尔·科恩(115)

农业机械化同生产和就业的关系.....[美] C·沃斯(119)

农业教育..... [日] 厚泽留次郎(127)

\*

\*

\*

克格勃的秘密活动..... [美] 约翰·巴伦(130)

小资料

世界的语言及其使用情况.....(139)

人物志

康托罗维奇.....(145)

◀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 请看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

江 云

下面选登的几篇有关苏联教育史方面的译文，特别是《十月革命到三十年代的苏联教育史》一文，值得大家一读。这篇文章，在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辩护过程中，曲折地透露了从十月革命到三十年代初期的苏联教育界先后发生的两次大辩论的若干情况。如果剥去这位作者披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细细一读，是很能发人深醒的。

十月革命的年代，是急风暴雨的年代，革命狂飙席卷着俄罗斯大地，洗刷着资本主义的一切污泥浊水，也冲击了教育这一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亲自领导下，教育领域中的革命新生事物蓬勃涌现：废除教会特权，清除宗教对教育的影响；废除旧学校的等级制度、民族限制和男女不平等；缩短普通学校的年限；废除考试制度；创办七年制工厂学校、工农速成中学、青年农民学校等工农学校；发动群众监督和管理学校教育；等等。这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向资产阶级的宣战。然而，资产阶级及其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决不肯轻易退出他们长期盘踞的教育领地。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爆发了一九一八年的苏联第一次教育大辩论。

辩论是围绕着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的。大会

需要制订一项改革教育的“统一劳动学校”的规程和原则。提交大会讨论的有两个草案，一个是莫斯科代表制订的，一个是彼得格勒代表制订的。莫斯科草案制订者的一派认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生产劳动是统一劳动学校的基础”，必须从根本上“打倒关门的学校”。而彼得格勒草案制订者的一派却认为，生产劳动只是“掌握普通科目的一种教育手段”，主张继承、保留“三脱离”的旧教育制度的遗产。在克金克拉泽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场辩论是进行得相当激烈的。在大会前的《统一劳动学校规程》草案定稿委员会上，彼得格勒派处于多数，但是到了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情况发生了变化，代表们普遍欢迎并通过了莫斯科派的方案。文章的作者把这归之于莫斯科派利用代表们对沙俄学校棍棒教育的仇恨心理，以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辞句骗取了代表们的信任。这是卑鄙的伪造历史。事实上，正是由于列宁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痛斥了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才煞住了彼得格勒派掀起的第一次复辟倒退妖风。

经过第一次阶级力量的较量，资产阶级的气焰稍为收敛一点，但是，当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以后，教育领域的右倾翻案之风又刮起来了。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以后，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更为猖獗，并终于导致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苏联教育界的第二次大辩论。这次大辩论是围绕着如何估价二十年代的教育革命而展开的。那个时候，什么“学校消亡论”啊，什么“无政府主义”教育啊，什么“实用主义”教育啊，什么“对遗产利用态度不正确”啊……，一叠一叠的帽子飞向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的人的头上，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无产阶级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充分肯

定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克鲁普斯卡娅明确指出：“右倾分子是无论如何不会摆脱旧的一套的，他们对新鲜事物都深表怀疑，他们紧紧地抓着旧尺度不放”，“想把学校往后拉”。这次辩论是以一九三一年为“转向”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措施而结束的，提出“为掌握基础知识而斗争是学校工作中的决定性环节”，法定“正规化的教育大纲”，“系统化的知识范围”，确立“班级授课制”，严格“按课程表办事”，严格“考核制度”，确立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等等。经过这次辩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已经在苏联占了上风。克金克拉泽在文章中谈到这一段历史时，真是绘声绘色，他认为苏联的“科学”的教育史，就是从三十年代初期才开始的。

三十年代以前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它说明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教育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

教育，这是一个培养接班人的社会领域。无产阶级懂得这一点，资产阶级也非常懂得这一点。因此，当资产阶级丧失政权，丧失生产资料以后，必然要在教育领域进行疯狂的反扑，妄图以此作为复辟的重要阵地。列宁非常关心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坚决主张废除“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的旧学校。当年，他曾经满怀激情地说过：“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青年团的任务》）可是，由于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情况却大变了。列宁在世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现在的这一批主要头目，当时还多是一批十四、五岁的少年。不言而喻，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对于产生这批毒果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教育领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

性，还在于教育领域历来是剥削阶级盘踞的世袭领地。剥削阶级在这里长期经营，盘根错节。几千年的影响，短短几年、几十年是改不过来的，要经过几代人的斗争。因此，我们对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必须有深刻的认识，不仅是斗一次、二次、三次，而且要准备斗它十次、百次，直至斗到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影响在地球上彻底消灭为止。

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也说明，教育战线上的斗争决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它是整个社会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同经济领域的斗争息息相关。一九二五年，联共（布）召开了十四大，提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坚持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还是推行“技术第一”、“专家至上”、“物质刺激”？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当时，苏联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攻击列宁的教育路线，否定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也正是以工业化需要培养专门人材为借口的。这种借口同苏联经济领域中的修正主义谬论完全是相互配合、遥相呼应的。

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还说明，要不要彻底改造旧学校，教育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教育领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它不是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就是培养资产阶级的驯服奴才，工人的子女在那里受教育，实际上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十月革命以后，在列宁主义路线指引下，苏俄广大师生走出校门，到工厂去办学，到农村去办学，同工农相结合，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这个大方向是完全对的，这是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革命行动。资产阶级及其在联共（布）党内的代理人暴跳如雷，恣意攻击，也不足为怪，因为这触及到了他们的要害。苏联三十年代以前的两次大

辩论告诉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教育革命的根本，决不允许转向。

苏联教育界的两次大辩论还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要向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进行反扑，总是首先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一直胡说二十年代的教育制度是“劳动太多”，把教育“搞乱了”，“学校的根本问题是教育质量太差”，他们甚至还以学生的错别字来证明教育改革“搞糟”了。

什么是教育质量？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标准。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个人即使文化再高，如果方向不对，不仅无用，而且对社会有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经过大学培养出来的所谓“红色专家”，正是他们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我们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教育革命怎么搞，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按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实践，从儿童时期起，每天劳动两个小时，以后增加到四小时、六小时，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但是，教育要革命，这是无产阶级的坚定不移的历史使命。不管前进的路上多么崎岖曲折，这个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一定能够完成。“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个真理，不论对中国无产阶级，对苏联无产阶级，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是适用的！

# 十月革命到三十年代的 苏联教育史

〔苏〕O·Д·克金克拉译

苏维埃教育学史，可以分为下列几个时期：

第一时期（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九年），在这个时期，要谈论作为一门科学的苏维埃教育学，还为时过早。

第二时期（一九三〇至一九五八年），是科学的苏维埃教育学形成和进一步发展时期。

第三时期（一九五九年以后），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苏维埃教育学发展时期。

##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教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过去由国民教育部执行的全部职能，改由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来完成，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教育人民委员 A·B·卢那察尔斯基。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颁布了列宁签署的关于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后来取消了阶层和民族的限制，消灭了原先在国民教育领域中妇女所遭受的权利不平等现象等等。

就这样，对国民教育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制订学校体制的总的原则和理论工作，就由国民教育委员会来承

担。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年里，批判旧的教育理论、原则和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教育问题，这些工作就全部由国民教育委员会承担。

有两个基本因素促使能够比较迅速地、在很短时期内成功地拟订出新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总原则：（一）在列宁的著作和十月革命前党的一些重要文件中，国民教育的基本方针已经提出来了，共产党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政治路线已经确定了，新学校的建设道路也已经指明了；（二）为改革学校工作所必需的教育研究任务和具体的改革工作，都由一个中心领导。

一九一八年夏天，举行了三次国民教育方面的代表大会。六月二日到六日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六月五日，列宁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在代表苏维埃政府对会议的参加者表示祝贺的同时，列宁号召教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教学活动的圈子里，要把这一活动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过了一个月，七月三日至八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俄教师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将进步的教师力量团结在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周围起了重大的作用。大会的参加者痛斥了全俄教师联盟的反革命活动，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号召教师脱离这个反人民的联盟，参加到国际主义教师队伍中来。从一九一八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到九月四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研究了学前教育、学校体制和成年人的校外教育等重要问题。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充满了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当时所处的时代的气息。列宁指出：“国民教育事业是我们目前斗争的组成部分。”列宁谈到了资产阶级学校的阶级本质，谈到了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是在革命斗争中受到了完备的教育，还谈到学校不能脱离生活，脱离政治。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充分发挥了关于学校和生活

相联系、和共产党的政策相联系、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相联系的列宁主义原则，对理解苏维埃学校和苏维埃教育学在新社会的作用和地位，起了重大的作用。实际上，这个列宁主义的原则是苏维埃教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代表大会审查和通过了国民教育委员会制定的《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的草案和《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

应该特别强调，A·B·卢那察尔斯基，特别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制订新的劳动学校的基本理论原则方面起了最显著的作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按照A·B·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在当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首脑人物，她的学说包含了“新教育学的核心”。他们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中，都是以党对国民教育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纲领性要求为出发点，并按列宁的指示和建议办事。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研究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观点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得出了一些关系到未来的结论。她指出，劳动学校不能够建立在读书学校的原则基础上，劳动学校要求个性化，要求发展学生的主动精神和独立性，劳动学校要求新的方法和新的教师并以教学和生产的紧密结合为前提；她指出，把读书学校改造成为劳动学校，就要改组国民教育工作的整个组织。

在《规程》和《劳动学校基本原则》通过前不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日召开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最高目的》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她谈到了有关教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Φ·Φ·卡拉廖夫在其《苏维埃学校和苏维埃教育学史论文集》中指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对从根本上改造学校的准备工作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她阐发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原理：

“(一) 资产阶级学校的中级和高级阶段，只是为有产阶级的子女开放的。与这种学校不同，无产阶级的学校应该是真正的人民的学校。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准则的苏维埃政府，应该立即改变学校的阶级性质，使各级学校为各阶层的居民开放，不是在口头上，而是要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二) 资产阶级学校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在为劳动人民子女开设的低级学校(小学)中，它的使命就是‘用资产阶级的道德来熏染学生，削弱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成为一群易于指挥的听话的人。与这种学校不同，社会主义学校应该成为全面教育和发展个性的工具’。

“(三) 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共同目的，就是要培养具有完整世界观的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培养能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会建设理性的、丰富多采的、美好的和愉快的生活。‘这样的人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没有他们，社会主义就不能完全实现’。

“(四) 为所有人所设立的第一级学校，主要应具有实践的性质。应广泛地采用教育的劳动原则，增强孩子们的社会观点并训练技能。第二级学校招收这样一些年龄的孩子，他们能把所得到的印象充分接受、进行加工并系统化。这类学校应注意帮助正在成长的一代的世界观的形成，用科学的认识论武装他们，给他们指出运用所获得的知识的方向。

“(五) 与压抑学生个性并使之发生畸形变化的旧学校相反，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新学校，不应压抑学生的个性，而应帮助个性的形成。‘但是，在帮助形成个性时，学校应该做到使学生能在公益劳动中显示出这种个性’。

“(六) 教学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学校最重要的

原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道：‘现在很多人在谈论劳动的方法，但是在社会主义学校中，不仅要采用劳动的方法，而且要把儿童的生产劳动加以组织。社会主义者反对剥削儿童的劳动，但他们当然是赞成儿童力所能及的、全面的和逐步加强的劳动的。生产劳动不仅能把孩子培养成未来社会的成员，而且能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孩子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是有巨大教育意义的。’

“（七）目的的统一决定着学校的统一。学校应该是统一的。但有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读完完全学校。‘国家未必能够，至少在初期未必能够保证全体公民都有可能学习到十七岁。因此必须把学校分级。’

“（八）为所有的人开放，对所有的人一致，能保证个人的全面发展，发展学生的个性，把教学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学校，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才可能有。当社会建立在划分贵族和非贵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学校就没有任何的立足点和基础。

“（九）当现代中学的目的尚未改变，同生活脱离的现象还未消除，当这种学校还继续培养贵族老爷和特权阶层时，即使完全免费，它对广大群众来说也是格格不入的。”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 A·B·卢那察尔斯基把学校看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他们为科学的苏维埃教育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 第一次教育大辩论

这样，当国民教育委员会大规模地开展对学校改革的理论研究时，一些基本的原理都已经成熟了，这对准备实行学校的社

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宝贵的贡献。尽管如此，就《规程》草案的某些问题，还是向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文本。这是由于起草这些文件的委员会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问题是，有关改革学校问题的研究工作，不仅在莫斯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改革处中进行，同时也在彼得格勒北方省公社联合会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中进行。两个人民委员部都是由卢那察尔斯基领导的，但是草案的起草准备工作仍然是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这两个草案的基本区别就在于，根据莫斯科草案，生产劳动是统一学校的基础，而彼得格勒草案则将劳动视为掌握普通科目的一种教育方法。毫无疑问，彼得格勒人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国民教育委员会委托 A·B·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B·П·波焦姆金、B·P·曼仁斯卡娅、П·И·列别申斯基、B·M·波兹涅尔和其他一些人，为《统一劳动学校规程》草案定稿。在这个委员会中，莫斯科草案的作者和支持者处于少数。委员会将草案的最后定稿，提交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进行讨论。然而在代表大会上，П·И·列别申斯基和 B·M·波兹涅尔，仍然坚持被定稿委员会所否定的莫斯科草案中的那些条款。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A·B·卢那察尔斯基作了十月革命后教育人民委员部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他强调指出，对社会主义教育的研究工作是在非常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同时他又指出，《统一劳动学校规程》草案的制定，是人民教育委员部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成就。为了捍卫草案的基本论点，A·B·卢那察尔斯基说：“我们把劳动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也即作为一种对技术的充分的研究。我们把劳动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因为我们知道，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我们才能够培养性格的种种特点，

这些性格特点使个性经久不变和富有价值，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认为劳动就是少年儿童参加到居民所从事的共同劳动中去。”（A·B·卢那察尔斯基《论国民教育》，一九五八年莫斯科版）这个思想曾作为 A·B·卢那察尔斯基所领导的彼得格勒派所制定的草案的基础。根据这个草案，学校、课堂、学科、班级、家庭作业都保留了下来。这个时期，卢那察尔斯基在自己的许多发言和文章中，都坚持了建设社会主义学校的党的原则。他认为，学校应该是劳动的学校，学校中的教学应该具有综合技术性质，但不是那种常常被错误理解的狭隘的职业性质。

在这个代表大会上，莫斯科草案的代表，它的作者之一，莫斯科派的领袖 П·И·列别申斯基也做了报告，主要是揭示了“劳动学校”这一概念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一方面阐述了委员会所通过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又坚持莫斯科草案中关于公社学校和全日全年学校等等条款。这个被 A·B·卢那察尔斯基公正地称作无政府主义的草案，实质上，要求用“儿童生产公社”来代替学校。按这个草案作者的意见，公社学校应该全年工作，一个星期中没有休息天，一天的工作时间也不受限制。打算不再分年级。总之，连大纲也认为是多余的。П·И·列别申斯基在自己的报告中，企图发挥教学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思想，但是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陷入了无政府主义。在为建设新学校探寻途径时，他未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П·И·列别申斯基不正确地解释了劳动、学校的社会活动、自我服务等等的意义，使这些活动在学校生活中所占比重过大。当一九一八年初党派他到教育人民委员部去工作时，他的这种错误立场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一九一八年四月，他以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的身份领导了学校改革处。还是在一九一八年秋天，П·И·列别申斯基就在白俄罗斯利特维诺维奇农村建立了第一所苏维

埃实验公社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搬到莫斯科，成了莫斯科列别申斯基实验公社学校。这个公社学校中的课程就是根据这样的原理开设的；学校研究的主要题目，应该是人类社会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劳动。

莫斯科草案和彼得格勒草案的作者们，从不同的立场来确定教学各个阶段上的教育内容，对于解决组织学校教学活动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原则上也是各不相同的。

经过激烈辩论以后，大部分与会者不顾被指出的错误，还是同意了莫斯科草案。最后，大会通过了一个包含一系列错误论点的草案。例如，《学校工作的基本方式》这一节的第十二条写道，“生产劳动不是作为一种支付孩子们生活费用的手段，也不单是作为一种教学的方法，而正是作为一种公益的生产劳动，它应该成为学校生活的基础。”接下去，在《学校工作制度和条件》这一节中的第十七条规定：“不允许上必修课和布置家庭作业”；第十八条，“学校中禁止任何的惩罚”；第十九条，“入学、升级和毕业考试一律取消”；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条款。

应该指出，当时所特有的那种对以“必修课”、“惩罚”和“考试”为特点的革命前的旧学校持否定态度的普遍倾向，反映在人们对莫斯科草案的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错误论点的支持上。沙俄资产阶级学校所推行的那套机械训练、呆读死记和严厉的棍棒纪律，使人记忆犹新。因此，一切外表和旧学校相似和令人想起旧学校的事物，在那时都要引起强烈的反对。根据我们的看法，这就说明，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参加者，由于看出了莫斯科草案已摆脱了革命前学校中“教育工作的普遍组织方式”，而同意了它，并且支持了这个草案中所表达的一些错误论点。与此同时，这是寻求教育的崭新途径和方法的年代，是进行试验的年代，而这些试验远远不是经常能够成功的。由于评

价教育学的古典遗产和利用旧学校积累的经验的态度的态度不正确，就使教学过程受到了破坏，而且造成了教学方法运用上的混乱现象。所有这些都影响到代表大会的进程和工作总结，但是，这次大会毕竟在苏维埃教育学和学校的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国民教育委员会通过了《统一劳动学校规程》草案和《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并呈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批。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两个文件都刊登在《全俄执行委员会公报》上。《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后来称作《统一劳动学校宣言》。这个文件好像是《规程》的说明书，里面的基本条款和章程文件一样阐述得很简短，没有论证和解释。《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和《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在苏维埃学校的历史上和对新型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形成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苏维埃教育学的奠基者们的集体劳动的总结，他们对创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理论，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还包含了对共产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的一系列指示：（1）有一定教育内容的智育：“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所有这些教学的课程不仅允许创造性的、积极的教学方法，而且要求运用这种方法”；（2）德育：“教育性的学校，如果可能，应努力消除儿童心灵中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人们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学校在培养儿童们迎接未来的同时，应努力从小学开始就组织起一个个坚强的集体，最大程度地发展儿童们追求共同感情和团结的能力”；（3）美育：“美育指的不是教授某种简单的儿童艺术，而是系统地发展感觉器官和创造能力”；（4）体育教学；（5）劳动教育，还规定了“通过劳动熟悉孩子周围的自然界和社会环境”；

(6)综合技术教学，通过综合技术教学，学生应该熟悉了解一切最主要的劳动形式的劳动方法。

在《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中，按新的方式提出了培养自觉纪律的问题，学生和教师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制定《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时曾确认，“培养新的教师，意味着新的学校建立了一半，意味着促使新的民主制的建立”。因而，原则上全新的学生自治问题的提出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学生自治，在解决学校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化这一共同任务中，处于极重要的地位。《基本原则》的作者们认为，“儿童应该参加学校的全部生活”。与此同时，作者们还指出了实现这一要求的途径，“为此，他们应该运用自治权和表现出经常的积极的互相帮助。在准备成为国家公民的同时，他们应该尽可能早地感到自己是自己学校的公民”。还指出了学生的学校自治的形式。这些形式分为三项：(1)“学生参加学校的各项管理委员会”；(2)“纯粹的各种学生班级的自治”；(3)“组织各种社团的充分自由，如科学小组、墙报编辑部、政治讨论会、展览会、体育团体、戏剧团体、合唱团、乐队等等”。

《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和《统一劳动学校规程》，也包含了一些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特点所造成的错误观点(选举教师，取消考试和其他等等)。但也有一些受到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学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教育“理论”影响的论点。这就是承认劳动是教学的基础；不正确地解释劳动和教学中的科学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综合技术教育不够理解；等等。

在确定新学校创立途径的最初文件中，这些和其他一些错误论点仅仅是局部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影响。在这些年代中，这些影响表现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活动中。而正是他们，制定了新

学校的建设原则，因为他们身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改革处的负责岗位。

一九一九年三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纲对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国民教育方面的新任务规定如下：“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国共产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是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在思想、组织和教育方面传播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便培养能够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同时，党纲还作出了为解决所面临的任务的具体指示：

“（1）对十七岁以下的所有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2）建立学龄前的教育机关网：托儿所、幼儿园、日间托儿所等等，以改善社会教育和解放妇女。（3）完全实现统一的劳动学校的各项原则：在学校中以本族语言讲课，男女儿童同校，使学校绝对成为世俗的，即摆脱任何宗教影响，使教学工作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4）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以膳食、服装、鞋袜及教材和文具。（5）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育工作者。（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7）国家全面协助工农自学自修（建立校外教育机关网：图书馆、成人学校、民众文化馆、大学、训练班、讲座、影院、艺术工作室及其他等等）。（8）对十七岁以上的人，广泛地发展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有联系的职业教育。”俄罗斯共产党党纲中提出的

关于教育目的的经典论述，确立了苏维埃学校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目的，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中，是要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要培养能够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

一九二〇年十月发表的《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在列宁的教育学遗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苏维埃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纲领性的意义。这本书是列宁对他有关教育、学校问题的基本观点的一篇总结。这是一篇包含着多方面内容的著作，研究了有关苏维埃教育学的下述各项重大问题：关于教育和学校的阶级性质，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关于智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精神的教育。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举行的第一次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专门讨论了在新的条件下学校发展的道路问题。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学校或儿童之家，哪一个应该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本环节？经过激烈的辩论，会议决定改变从一九一八年就沿用的一级和两级学校的体制，创立七年制学校，把它作为普通教育学校的基本形式和在和平建设条件下已经改变了的新型国民教育体制的基本环节。

## 第二次大辩论

苏维埃的恢复时期即将结束。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要进一步发展工业。党采取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召开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样，对具有中等和高等专业水平的专家，以及对具有适当的普通和技术知识水

平的熟练工人的需求就显著地增长了。鉴于这一点，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联共(布)中央全体会议上，多次讨论了改组培养干部的体制，巩固中等普通教育等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联共(布)十五次代表大会制定了竭尽全力发展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后，这些任务日益增加了。代表大会以列宁的文化革命计划为指针，并把这一计划加以发展，强调指出，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文化水平，是保证在苏联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在十五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到，应该把国民教育的这些任务，如通过实现普及教育、扫盲、群众性职业技术教育来保证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培养有专业技能的专家和科学工作者等，作为文化建设计划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向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大学生会议发出的号召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些任务。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他又重复了这个问题，并号召苏维埃青年掌握科学。斯大林说：“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需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他继续说：“在我们面前有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就叫做科学，它包括许多部门的知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65页)

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这就是当时的任务。因此，必须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

苏维埃教育史第一个时期的最后几年，是以国内文化生活

中的最重大事件为标志的：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出版了第一本苏维埃《教育百科全书》。

《教育百科全书》的出版是苏维埃学校和教育历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但是，百科全书编辑部的担心还是得到了证实。在对一些最重要的教育问题的阐述中，表现了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的许多著名代表人物的理论修养不足，对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以及对教养、教育和教学等科学问题没有一定的见解。

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的教育大辩论中，降低教师作用，否定班级授课制，以及最终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学校消亡论”等倾向，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此外，辩论还涉及了这样一些广泛问题，如教育学的对象，它的基本任务和范围；教学过程；教养、教育和教学的实质，“组织的”和“自发的”教育过程；学校参加国家的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问题等等。大家对这些教育学的根本性问题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以 П·Н·勃隆斯基、А·Г·卡拉什尼科夫、А·И·平克维奇和其他教育家，主要的是国立莫斯科大学附设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为一方，以学校工作方法研究所的领导人 В·И·舒里金和 М·В·克鲁佩尼娜为另一方。В·И·舒里金和 М·В·克鲁佩尼娜的发言成了辩论的开端。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出版了学校工作方法研究所汇编的《科学教育学问题》，А·Г·卡拉什尼科夫写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论文集》和第一卷《教育社会学》，В·И·舒里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首要任务》，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育学的争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问题》，克鲁普斯卡娅共产主义教育科学院的一些著作，В·В·科英罗弗斯基写的《科学教育思想发

展的辩证法》，B·Я·斯特鲁叶明斯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初探》和其他许多著作。

在积极参加辩论的人员中，有B·H·舒里金。他是学校工作方法研究所的首创人之一。作为改革处副主任，后来又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统一学校处的主任，他积极地参加了改组学校教育体制的一些重要措施的准备和落实工作。与此同时，B·H·舒里金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研究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学生的社会公益活动，环境在教育中的作用等等问题。在他的一九二四年出版的《社会教育的基本问题》，一九二五年第四次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教育》，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等著作中，都谈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在深入研究以上问题时，B·H·舒里金犯了严重的教学法的错误。在一九二九年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共产主义教育科学院出版的《马克思教育学的首要任务》这部著作中，B·H·舒里金坚决主张，必须研究苏维埃、工会和党的教育学，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他把教育同个性的社会形成的全部过程混为一谈，在自己的一些教育观点中坚持了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扩大会议上，A·B·卢那察尔斯基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他的这种有害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念。卢那察尔斯基强调指出，“毫无疑问，舒里金的最大错误是否定学校。他认为学校本身是资产阶级的东西”（A·B·卢那察尔斯基：《论国民教育》，莫斯科，一九五八年）。

M·B·克鲁佩尼娜和B·H·舒里金一起共同发展了这种有害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她认为设计法是教学工作的万能法。辩论的参加者从各种不同的立场来看待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B·H·舒里金和M·B·克鲁佩尼娜，把教育看成是

对人们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的全部综合,并认为有必要研究“自发教育过程”的规律。在提议编写苏维埃、工会和党的教育学时,他们把生活同学校对立起来,将所谓的“个人体验”的教学同科学教育对立起来。正是由于这点,使他们得出了荒谬的结论,好象与国家消亡的同时,学校也应该消亡,学校的地位将由校外工作的各种不同形式和方法所取代。

A·Г·卡拉什尼科夫、A·П·平克维奇和其他一些人,坚持了另外一种意见。在《教育学》和以后的《十年来的苏维埃教育学》这些书中,A·П·平克维奇是以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的。他断定,教育是对人们的肌肉、肺、大脑、心脏、肠、感觉器官、反映和嗅觉等等先天条件的影响,教育的目的在于保证这些条件正确的、“正常的发展和预防这些条件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破坏”。这样,教育的概念和实质就归结为卫生、体育以及对反映和嗅觉的影响。

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一些或那一些错误论点,A·П·平克维奇还是对苏维埃学校和教育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宝贵的贡献。他把教学法、理论和历史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同积极的社会政治活动相结合,与此同时,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他还参加了学校教育的改组工作。一九二六年,A·П·平克维奇领导教育科学研究所。在教育大辩论中,他坚持了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立场。A·П·平克维奇还是首批编写教育学著作的参加者之一,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继承了过去的遗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出版了他的《现代学校的基本问题》和两卷集的《教育学》,一九二七年出版了《十年来的苏维埃教育学》,以后又出版了他的《科学教育学》,这本书后来还被编入了一九二八年出版的《苏联的社会科学(1917—1927)》汇编集。

《十年来的苏维埃教育学》一书,对十月革命后初期教育理

论家的言论所进行的相当有意义的批判性分析表明，尽管这个时期为对教育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研究作了顽强的斗争。可是，仍然没有能够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影响，甚至象对教育学的定义这样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教育理论家中也没有统一的看法。因而，А·П·平克维奇写道：“可以认为，所有苏维埃教育家把教育学作为有关教育过程的一门科学这一定义上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怎样来理解教育过程，却缺少一个毫无疑义的看法。” А·П·平克维奇的另一部篇幅不很大的著作《科学教育学》，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部著作对教育学领域在过去十年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了总结：“十年来，全苏联有千百万人受到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教师和教养员，建立了大批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实际上，在十年临近结束的时期，整个苏联是一个巨大的教育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样通过相应的措施教育人民群众，使他们能够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使他们有能力进行有计划的、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试验同一般实验室的区别在于，这个试验没有同生活隔绝，相反，它既是一种尝试，又是一种群众性的工作，在生活中实行那些经过考验的建议和提案。如果在另一个时代的话，那就可能是缓慢地、小规模地进行这些试验，在取得试验的良好成果之前会停留在老地方；而在革命的时代，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出发点已经牢固地确立，就不应该等待‘小规模’试验的成果，而需要在尝试中同时改造生活。这一点是做到了。不是没有错误，不是没有个别的不顺利和挫折，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总的来说是正确的。”

在这些著作中，基本上正确地确定了苏维埃学校和教育的目的，同时也正确地提出了遗传、环境和教育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些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不同于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

苏维埃教育学的性质。与此同时，这些著作也包含了一系列错误的论点：教育学被定为社会生物学和应用科学，教育被看作是对儿童天生特性的促进等等。但是，在和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的斗争中，这些著作的作者终于向马克思主义对教养、教育和教学实质的理解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始终不渝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观点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A·B·卢那察尔斯基，在教育大辩论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正是主要地通过他们的努力，才克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奠定了真正的苏维埃科学教育学的基础。

但是，在这个阶段还有许多不清楚和没有获得解决的问题。结束了苏维埃教育学第一阶段大辩论的那些参加者，并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象苏维埃教育学的对象和范围、政治和教育的互相关系、教育和社会环境在形成个性中的作用等等有关教育的一些重要问题。

象教科书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从错误立场来解决的。教科书总的来说常常被否定掉。对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问题，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苏维埃教育学在力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综合技术教育的观点同把劳动看作为一种教学论手段的观点相结合时，还是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苏维埃教育学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条件下产生和形成这一事实促成了这种情况。对学校教育的革命改造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的反对者是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阵地的。在对反动的教育思想的斗争中，并非所有的苏维埃教育家都能为保卫苏维埃教育学的思想原则表现出必要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这是由于许多教育家都是从革命前过来的，由于没有足够的理论修养，他们没有能够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继续坚持“自由教育”的思想，实质上，是企图为教育

同政治脱离、学校同国家脱离提出论据。

苏维埃教育学史第一个时期是以巨大转折的一年而结束的，这一年标志着开展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开始。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九年这段时期的特征是，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深入研究教育问题而斗争，这个时期为苏维埃教育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是由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为首的，А·В·卢那察尔斯基、П·Н·列别申斯基、П·П·勃隆斯基、С·Т·沙茨基、А·П·平克维奇、М·М·皮斯特拉克和苏维埃教育学的其他奠基者的集体努力所创造的。但是，在当时还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能说明教育理论的、高水平发展阶段的苏维埃教育学新的论著。这对教育实践的状况、教学、教育工作的方向和内容，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和对儿童教育学的曲解，是苏维埃学校和教育学发展的最大危险。因此，必须使苏维埃学校摆脱这些影响。由于一九三〇年实行了以单元-设计为基础的新教学计划，教学、教育工作中的缺点就更加严重了。

设计教学法的实质是，这种教学制度使学生在设计和完成不断的复杂化的实际任务(设计)过程中获得知识。这种方法产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农村学校，然后推广到普通学校中去。从二十年代开始，设计教学法引起了著名的苏维埃教育家的注意，他们认为，经批判修改的设计教学法的运用，将有助于发展学生的主动创造精神和独立性。

·完善设计教学法的尝试，导致了单元-设计教学大纲的创立。这份大纲的引言宣称，设计教学法是教学工作的基本形式。在引言中指出：“作为理论和实践有机联系的设计教学法，是学校工作实践所提出的。”

根据这些要求，每一个题目以大纲形式分成许多设计。例如，“春季、夏季工作”这个题目分成下列设计：(1)参加春播；(2)组织照管马和牛；(3)组织对果园的夏季管理；(4)培育菜种；(5)和缺乏饲料作斗争；(6)为农村环境卫生和公共福利作斗争；(7)夏季集体农庄的文化生活工作(调查农村图书阅览室，农村俱乐部和其他)。

这样一来，班级授课制和教学大纲的分科制被宣布为过时的教学工作组织形式，而这种做法导致了学生普通教育水平的降低和对组织综合技术教学的粗鲁曲解。在开展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条件下，学校教学、教育工作中的这些缺点是不可容忍的。苏维埃学校和教育学面临新的任务，这些新任务在三十年代初期联共(布)中央通过的有关学校的决议中都已作了阐明。

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初等和中等学校》的决议是转向的开始。在这个决议中，党中央委员会批判了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以及破坏学校的“设计教学法”，并强调指出，为掌握基础知识而斗争是学校工作中的决定性环节。决议中也指出，在实施共产党教学大纲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同时，党中央委员会指出，苏维埃学校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在它面前所提出的巨大要求。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目前学校的根本缺点在于：中小学的教学没有给学生充分的普通教育知识，对培养有足够读写能力、能很好掌握科学基本知识(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地理等)的学生，并输送他们升入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这个任务，执行得不能令人满意。”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因此往往流于形式，并不能培养儿童成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掌握技术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任何想使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同系统地、和牢固地掌握自然、数学体系的各种学科，特别是掌握那些依据严格制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且按照严格规定的课程表进行教学的各种学科相脱离的任何企图，都是对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这一思想的极粗鲁的曲解。

由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提醒学校摆脱轻率的教学法的空洞计划，摆脱大规模地推广事先没有在实践中检验过的方法，从而防止了对苏维埃学校的破坏。由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而引起的那种把所谓的“设计教学法”，作为全部教育工作基础的企图，事实上已经引起了对学校的破坏。根据决议中阐明的这些列宁主义的原理，决定了学校的基本任务，拟定了改进教学法领导的措施，确定了改进教师工作、巩固物质基础和加强对学校领导的要求，顺利地解决了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任务，保证了学校工作朝着上述决议中所指出的方向转变。正因为如此，在决议的结束部分谈到：“中央委员会着重指出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益增长的意义和作用，建议一切组织要进行经常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反对那些对党在学校工作方面的政策所进行的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曲解。必须加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加强反对‘学校消亡’论和降低教师作用的理论的斗争”。

教育学方面的科学与研究工作应该适应上述决议所提出的任务：(1)组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大纲的制定工作，保证在教学大纲中包括正确规定的系统化的知识范围(国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2)考虑到反列宁主义的“学校消亡”论，及由它而引起的那种把所谓“设计教学法”作为全部学校工作基础的企图所造成的对学校的破坏，促使在教学实践中运用那种有助于培养富有主动精神的和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参加

者的新的教学方法；(3)研究在教学法上帮助教师的主要问题。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教学大纲和生活制度》的决议。这个决议不仅是教学工作内容方面的指示，而且是教学、教育组织和方法方面的指示。党中央委员会批判了“分组实验法”和轻视班级授课制之后，规定“有严格规定的课程表和固定的学生成员的分班上课，是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决议指出，这种形式包括在教师领导下采用各种教学方法所进行的全班作业、小组作业和每个学生的个别作业。决议中还包含了有关发展集体的教学工作形式、加强自觉性纪律和教师职责的原则性指示，也包含了有关学生知识的考核制度。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少先队组织工作》的决议中，涉及到学校教科书、少先队和中小学生学习社会政治任务负担过重和改进历史和地理教学的一系列决定，对改进教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这几年所通过的决议，涉及到苏维埃学校教学、教育工作的一切领域，对于研究教育学的最重要问题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然而，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主要的注意力应放在教学理论上。这是因为党中央委员会看到，三十年代初期学校的主要缺点是，当时学校没有给学生充分的普通教育知识，因而，为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培养有足够文化的、掌握基础科学的人这一任务，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学校和教育科学工作人员首先应努力解决的正是这一任务。因此，通过上述决议后，立即开始了主要是对苏维埃教学理论和某些学科教学法的紧张的深入研究。

一九三四年，国家教育出版社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教科书而

出版的 M·M·皮斯特拉克的《教育学》，是多年来所进行的全部工作的总结。这本《教育学》集中并系统地总结了当时苏维埃教育学思想所取得的全部精华。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教育出版机关在指出这本书的意义时强调：“在教育学科研究工作状况的现阶段，为高等师范院校编写完全合乎要求的教育学教科书的困难是相当大的。M·M·皮斯特拉克著的教科书是解决这一复杂任务的第一次尝试”。

在该书的《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一章中指出，学科体系是苏维埃学校建立大纲的唯一可以接受的体系。在《学校教育工作的组织形式》一章中，论述了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一章强调指出：“苏维埃学校只能在这种组织形式下工作，这种形式的基础是在教师和班长领导下进行的课堂教学，统一而稳定的教学计划，以及与教学计划完全符合因而是正确而稳定的课程表。”

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个时期中，在和苏维埃教育学中的“左”倾曲解的斗争中，正如 M·M·皮斯特拉克所指出的，十年中，我们学校的理论和实践都囿于这种曲解。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整个说来，斯大林的著作包含有以下几个基本论点：(1)把理论和完整的牢固系统的普通教育的作用提到应有的高度，不允许学校的综合技术化同科学基础的研究相脱离，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工作服从学校教学和教育的目的。(2)完全恢复和实现关于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中心领导人物的作用和意义的列宁主义思想，把教师的作用和威信提到更高的水平。(3)强调不断增长的学校的作用，提高学校的物质水平和威信，吸引全党和广泛的苏维埃社会舆论对学校的注意。(4)培养自觉的纪律、责任感、对劳动和学习的共产主义态度，改组所有儿童社会组织的工作和扩大教师所从事的坚韧不拔的教育

工作的范围。(5)要求仔细地考虑儿童的年龄特征,坚决取消给孩子们讲授他们的年龄所不能接受的知识,取缔和孩子们的年龄不相适应的同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形式。(6)强调必须同苏维埃学校中反无产阶级思想的分子作坚决的斗争。(7)根本改造苏维埃学校的教学法。

(摘译自一九七二年苏联出版的《苏联教育史纲》一书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

## 工人阶级参与苏维埃国民 教育体制的创建

〔苏〕B·A·腊祖莫夫

编者按：本文原载一九七二年苏联出版的《苏联文化建设史略》一书，这里摘译的只是有关史料的一部分。

党在扫除成年文盲的同时，提出了发展儿童教育的措施。

任务不仅在于扩大学校网，以便全体儿童都能受到教育，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学校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把学校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为此，党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有关学校生活问题发布了部务会议的决定。学校的最高组织机构是校务委员会。总务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派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并有表决权。参加校务委员会的还有三个有表决权的苏维埃代表。

在地方国民教育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各种国民教育委员会。劳动人民通过这些委员会对国民教育设施实行监督和发挥作用。工人和工会组织的代表分别参加了校务委员会以及区、州和市国民教育机构。教育是免费的。

所有学校都不准宣讲宗教教义。实行了新教学法，重新修订了教学大纲，取消了旧的和编写了新的教科书，等等。一九一

八年十月十六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劳动学校规程》，从行政上确立了和从法律上巩固了苏维埃国民教育体制建设的基础。

劳动人民、教育界的进步人士都积极地对待学校的革命性改革，批判怠工者们的反人民行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教师中的布尔什维克在《真理报》上向全市学生家长发出号召，号召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支持工农政府，要求学校民主化，不容许出现有对儿童进行反社会主义理想的敌对教育现象。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反对部分老教师罢课的斗争中，依靠了无产阶级。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彼得格勒市议会所属国民教育委员会，号召男女工人反对教师怠工，组织家长委员会和通过有关的决议。委员会要求区苏维埃、工会、工厂以及各级党组织举行抗议大会，要求怠工教师在节日后按照市议会提出的限期复课。

由于莫斯科市拉缅斯科耶区的工厂委员会坚决反对教师罢课，因而罢课没有得逞。

苏维埃政权决不容许破坏学校上课。由于在教师 and 所有担任教育行政职务的人们中间进行了选举，结果是一小撮怠工者被逐出了学校。这些选举，是一九一八年由国民教育委员会用公开表决形式进行的。不论是俄罗斯的还是外国的资产阶级报刊都恶意中伤说，所有教师几乎都要大换班。事实上，涉及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教师。例如在莫斯科，怠工延续了很久，劳动人民只更换了五千名教师中的一百五十人。

工人们热情支持那些坚决实现创建新型社会主义学校的进步教师，这对引导教育界站到苏维埃政权这一边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公报》发表了铁路工人的一封信，就是这种支持的一个事例。他写道：“年青教师们，你们好！……虽然你们的第一

步是不顺利的，虽然你们暂时还没有经验，但不要怕。同志们！在你们的心中有最好的引导者——自由的火焰。我们家长会永远全力支持你们。无所畏惧地前进吧！感谢、信任你们的工人会作你们的后盾。”

部分教师的怠工，尖锐地向苏维埃政权提出了培养自己的工农教育干部的问题。由于高等和中专学校毕业生的激增和采取推荐制度，教师人数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学年的二十八万增加到一九二〇年的四十万。他们的绝大多数成了苏维埃政权的可靠支柱。

工人阶级在保证学生和教师的膳食、衣服和教具方面和维修校舍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女工们参加了办理儿童食堂。一九二〇年，俄共（布）中央在公告里，建议地方党组织吸引她们去办公共的和儿童的食堂，参加反投机的斗争。

为了休息和增强体质，夏天把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儿童送到夏令营，儿童们在那里享受着国家供应。这样到一九一八年八月，莫斯科地区把约一万四千名儿童送往附近夏令营。举办儿童夏季休假的是各部门工会。

在国内战争年代，彼得格勒学校每天要分发面包。在郊区开办了“夏季学校”，劳动人民的小孩在那里生活和学习。在彼帖尔哥夫、斯特列里恩、巴甫洛夫斯克和谢斯特罗烈茨克，儿童们都住了最好别墅。所有学校里都出现了负责辅导单位的自愿帮助。

尽管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校舍建设并没有停止。一九一八年在俄罗斯联邦建造了三百五十七幢新校舍，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建造了四百七十二幢。

十月革命扫除了劳动群众在学习文化和获得专业知识的道

路上一切等级的、阶级的障碍。但这并不表明劳动人民马上就能实际享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力。诚然，在学历方面，他们不及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地主家庭的人，高校入学考试不能及格。此外，大学教授、教师中的很大一部分，都站在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反对高等教育实行民主化。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让工农青年有进高校的绝对优先权，使他们无产阶级化，并逐步引导大学教师站到苏维埃政权这边来；同时，依靠工农知识分子对大学的教授、教师队伍进行更新和补充。

劳动人民创造性的首创精神，启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途径和方法。工人们给地方政权机关教育人民委员部写信，建议改变高校招生办法。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真理报》刊登了一个中学应届毕业生小组的一封信。信里说：“从很早起，进入莫斯科大专院校的，即进交通学院和高等技术学校的，都是特权阶层，因为进这样的院校要通过竞争性考试”，而专门预备班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可以进去的，“特别是劳动者。由此可见，完全成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即进入我们大专学校的学生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信里还指出，彼得格勒已经废除了竞争性考试，并希望莫斯科也给与劳动者以升学的机会。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的具体条件下，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择中学应届毕业生的原则，成了高校发展的障碍，成了在民主基础上改造高校的障碍。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列宁为人民委员会草拟的《关于苏俄高等学校的招生问题》决议草案，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采取紧急措施，保证给一切志愿升学的人以学习机会。列宁强调指出：“首先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这个草案。遵照这个决议，废除了入学须缴毕业证书或文凭，废除了竞争性

考试和学费。

同时，草案解决了为劳动人民建立免费的普通教育预备班网，使他们顺利掌握了进高校学习的基础知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四个区，开办了第一批这样的预备班。进这些预备班的有一百二十个学员，几乎全是铁路工人。后来开办的“杜克斯”工厂附设预备班，招收了当地的七十名工人。“普鲁沃尼克”工厂附设预备班有一百四十人报名参加，大学附设的预备班有二百二十五人。一九一九年九月，莫斯科有十二个预备班，一千二百名学员。所有预备班都是业余的。预备班第一或第二阶段的学习在学校，也有在工厂。学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八十五，干部占百分之十，红军战士占百分之五。

很多城市都开办了预备班。

如因人多或住得远而不能上预备班时，就为劳动人民开办补习班或让教师直接到企业去。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国民教育科科长写信给卢那察尔斯基，要求“给该厂、西莫诺瓦镇、狄费列瓦森林选派一、两个大学教师，去培养准备进大学的工人和干部”。信里还说，厂里有上课的地方和设备。

高校民主化的一个步骤，是开办为工农进大学作准备的工农速成中学。

第一所工农速中，是在莫斯科扎莫斯科沃勒茨区工人共产党员的倡议下创办的。当时，需要挑选一批班组长进财贸学院。党支部号召扎莫斯科沃勒茨的工人报名，这样，就保证了从党员和无产阶级中挑选大学生。报名进学院的有一千名工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五金工和电工，在挑选中保证了大多数是党员班组长。但工人不局限于这一点。他们还决定设置有专业教学计划和大纲的新系科。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一日，教育人民委员部通过了《关于在苏

维埃共和国国立大学里成立工农速中》的决议，决议中总结了第一所工农速中经验。根据这个决议，莫斯科大学附设预备班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改成工农速中。到这一年年底为止，全国一共开办了十四所工农速中，其中，十二所附属于高等院校，一所附属于高等工业学校，一所是独立的，即从一八九七年成立的普烈契斯田斯基工人讲习班改建而成的。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在这些工农速中学习的有二千一百四十九人。一九二〇年开办的工农速中特别多，其中包括从白匪和干涉者解放出来的地区也开办了。同年一月二十日在鄂木斯克隆重举行了西伯利亚农业学院附属工农速中的开学典礼。在顿河的罗斯托夫成立了顿河大学附属工农速中。到一九二〇年底全国共有四十五所工农速中，二十九所附属于高等院校，十五所附属于高等工业学校，一所独立的。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校学生共有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七人。

一九二〇年九月，公布了由列宁签署的苏维埃政府关于工农速中的命令，提出要把吸收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进入高校作为基本任务。命令决定了工农速中招生的基本原则。由工会、农村党组织、州、区和市执行委员会选派工农去学习。命令还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为了配合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制定的教学计划，应该保证学员进高校有足够的准备。

当谈到工人阶级在建立工农速中的决定性作用时，应该指出进步的老知识分子的巨大功劳，他们中间的优秀教师热情支持高校实行民主化和无产阶级化的思想。

至于工农速中的组织机构，根据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它们具有高校的系一级的权力，可选派代表参加高校的校委常委会和所有集体活动，并能使用理化以及其他实验室的仪器、用具材料和教具。在分配房屋和安排课程表方面，大学行政机关有责任在可能范围内满足工农速中的

要求。工农速中学生也同样享有高校学生的权力，他们应当得到社会保证（从一九二〇年起，他们可领取相当于后方红军战士的口粮）。

无论是解决教学问题，还是解决总务行政问题，工农速中的组织都保证学员能广泛参加。领导机构是工农速中委员会，委员会选定一个秘书，以及由校长兼主席和两个委员组成的常委会。速中委员会由教师、学员代表以及大学校委会、大学生的党团组织、地方无产阶级组织、国民教育局和速中职工各一名代表组成。同时，速中委员会的学员代表人数，不应该少于教师代表的人数。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八日，教育人民委员部科学司部务会议所批准的工农速中条例，规定了详细的大学附属工农速中组织系统图。文件指出，工农速中由预科和大学班组成。会读、会写和懂得算术四则的学员进预科。分班级上课。速中基本分三个班：政治经济班；物理数学班，为学员进入高等工业学校和大学数学系作准备；自然科学班，为进入自然科学、医学以及农业等大学作准备。

进大学班学习的要能掌握口语、书写和运用自如，并一般懂得算术和几何。每个班学习两年普通课程。

大多数工农进入速中预科，因为他们往往还达不到修读大学班课业的程度。

把工农速中分成预科或基础科，是实际体现劳动人民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又一个步骤。应该指出，开办预科思想，最初产生在工农速中学员之间。这样，一九二〇年一月国立莫斯科大学附属工农速中，就在自己的倡议下开设了预科，或叫“初级”班。进这种班的是十四到十六岁的青少年，第一批是在工厂或作坊工作的青少年，第二批是童工。

工农速中自治组织注意维护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招生时力求各行业间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莫斯科大学附属工农速中常委会，通过了各行业间名额分配方案的决议。根据这个分配方案，五金工占百分之三十，纺织工占百分之十八，运输工占百分之十，印刷工占百分之八，缝纫、食品、化学工人和医药卫生机关工作人员各占百分之五，木器工和卷烟工各占百分之三，制革工、苏维埃服务人员、邮递员和清洁工、建筑工各占百分之二。

速中校委常委会不得不为缺少课室和实验室而斗争。但革命青年仍然以最大毅力克服了一切困难，胜利掌握了知识。半饥半饱的速中学生在没有生火的房间受冻，经常生病，可是他们没有放弃学习。在这样的条件下，上课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达百分之八十七。速中学生的强烈求知欲、工作能力和敏感性，甚至使那些对他们没有好感的教授和教师都惊讶了，怀疑和仇视态度逐渐地改为尊敬和力求帮助工农青年了。愿意在速中教课的教师人数也增加了。一九一九年二至四月，在速中工作的只有四十五位教师，而到一九二〇年二月，就达一千三百五十六人了。

速中校委常委会对教授和教师的劳动纪律实行了监督。因此，一九二〇年九月八日在国立撒马尔汗大学附属工农速中校委常委会的会议上，研究了教师的旷课问题。通过决议，不上课并且不在上课前说明旷课原因的教师，每旷一节课要双倍罚款。

工农速中学生关心教学过程物质技术基础的巩固。他们编制了详细的预算，列有教师工资、参观、购置教具和材料费、暖气安装费、实验室、研究室和制图室设备费。

此外，速中学生还设法自制教学设备和教具，组织修理和生产实验室、研究室的仪器设备，因为他们各自都在某种程度上

掌握了钳工、车工和木工方面的实践技能。一九一九年年底，莫斯科大学学习委员会决定，在所属工农速中创办小型实验室制造仪器。“初级”班（即预科）的图书馆小组准备了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他们出借书籍，开放阅览室。这个班装订小组整理了数学和文艺书籍。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斯摩棱斯克大学的工农速中兴办了教具制造室。两年中，这个室完成了一百五十项定货，做出了约六百张的照片曝光用表，九十张水彩画配色表和两千张幻灯片。举办了一个专门图书馆，里面约有五千张底片。所有教具都能广泛运用于教学。制造室既满足了速中本身的需要，也满足了大学其他系科需要。到一九二〇年底，不少地方的工农速中都已经有了学生们自己建成的图书馆、实验室和小工厂。

速中学生不管自己将来是干什么专业，都从不中断和企业的联系。他们在厂内举行演讲和报告，成立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课余表演小组，进行讨论和参观。喀山大学的工农速中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学等小组活动，举行纪念革命运动和文化上的杰出活动家的晚会。速中学生给了大学生很大的影响，他们把无产阶级觉悟的战斗精神带进了高校，进行了反对不问政治、个人主义和业务第一的斗争。就这样，工农速中既给工人们传授了科学技术知识，也是大学生受政治教育的学校，促进了他们的思想进步。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工农速中的教学和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方面，起了领导作用。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他们在速中学生中的人数是不多的。如一九二〇年，莫斯科大学党组织有五百五十六名党员和一百七十名团员，而当时速中共有二千一百八十五名学生。鄂木斯克工农速中党支部，一九二〇年有三十三名党员和预备党员。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这里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到年底，三百三十一名速中学生中有九十九名团员。一九二一年

在整个工农速中学员中，党员占百分之十三，预备党员占百分之六，团员占百分之五。尽管党团员人数很少，可是，他们对速中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是起决定作用的。

到一九二〇年底，速中学生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农民占百分之十五，红军战士占百分之十，服务人员占百分之十五。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学年结束时，第一批工农学生毕业了，共两百多人，其中，莫斯科约一百人，喀山五十人，彼尔米六十五人。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学年，从速中毕业了一千九百十九人，进入高校的就有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其中，进大学的有四百一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三），进技术、农业和其他学院的有一千四百三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七）。

通过吸收工农青年进入高校，并为他们胜利地掌握知识创造条件，建立培养新型知识分子干部的革命制度，就是这样开始了。

高度评价工农速中在高等教学中的根本改造和在培养有专门技能的专家方面的作用时，高度评价速中学生对大学生的巨大良好影响时，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工农速中还没有成为形成新知识分子队伍的主要途径。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年期间，速中为高校培养了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人，占当时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除速中外，几乎四分之三的应届中学毕业生都进了高校，而最初，速中学生并没有超过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到十二。

工农速中的建立，是无产阶级为培养工农专家干部创造条件而实行的必要和及时的措施。工农速中以及学校的党团组织，成为高等教育根本改造的支柱。

（摘译自一九七二年苏联出版的《苏联文化建设史略》一书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

## 学校的根本缺点

〔苏〕A·C·布勃诺夫<sup>①</sup>

当前，我们在为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奋斗的事业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中央在自己的决议中写道：“除了实施学龄儿童义务教育的各项决定性的步骤以外，学校又在教学跟生产劳动和社会工作结合方面向前迈进，因而在综合技术教育的根基上奠定了改造学校的基础。”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完成了学校方向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在于，我们对学校特别重视，并使学校很快地面向生产。在当时，只有很少学校没有和社会主义企业挂起钩来。我们完成了学校向综合技术教育制方面的转变。但正是由于这个转变，苏维埃学校工作中的重大缺点，也就极其尖锐地暴露了出来。

今年七月，在我代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向党中央递交的报告中确认：“去年我们在施行学校综合技术教育的事业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我们仍然还远远没有实现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从根本上全面改进学校工作的质量，适当安排生产教育，提高学生的教育水平，努力加强对师资队伍的马恩列斯主义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培养。”

---

<sup>①</sup> 作者于1929—1937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本文是他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演说。——译者

报告继续补充道：“这个任务是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部最近时期活动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任务。”

在整个学校工作大发展的情况下，学校现存缺点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传授的知识不足。

最近时期，国民教育机关对这项事业的注意是十分不够的。除此之外，在对学校进行综合技术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对教学方法作了歪曲。此外，“左倾”的空洞教学计划给学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与此相联系的是，学校方向的第二个转变。这个转变我们应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这学年中完成。这一年是非常紧张的一年，因为必须尽力保证学校所教授的普通教育知识的应有的数量，必须改进学校的整个体制，巩固学校的组织，整顿学校的一长制的管理和达到对学校的正确的、日常的、系统而全面的领导。

我们应该在两条战线上开展不调和的斗争：反对教育界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分子”。我们应该揭露和摧毁对“学校工作转变”的任何反抗的企图。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口号打掩护，不管他们是用“左倾”的词句打掩护，还是用导致放弃综合技术教育的右倾机会主义诡辩打掩护。

中央决议是怎样说明这个时期学校的根本缺点的呢？

首先，中央确认：“苏维埃学校还远远没有适应现阶段社会主义向学校提出的那些重大要求。”中央接着又指出：“学校在这个阶段的根本缺点在于，中小学的教学没有给学生充分的普通教育知识，并对培养有足够读写能力的、能很好掌握科学基本知识（物理、化学、数学、祖国语言、地理等等）的学生以升入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这个任务，执行得不能令人满意。”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学校中存在的“根本缺点”，这就是学校

工作中的那种薄弱环节。我们必须消除学校的这种根本缺点。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地方党组织、国民教育机关、文化界、群众文化运动、“教育工作人员中的新生力量”，都全部致力于消除这种根本的缺点。

毫无疑问，这个领域的成就为掀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原则基础上改革学校的新高潮，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一九三一年五月，列宁格勒州党委会根据州人民教育局局长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在列宁格勒州实施普及教育和扫盲的步骤》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列宁格勒州党委会对州人民教育局和区教育局作了这样的指示：“……保证提高学生掌握所有必要技能和综合性知识的成绩”，这个问题在当时有着特别的意义。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引用以下一个调查的结果。这个调查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顿河区的三个地区进行的，调查包括了四百五十八个学校班级。这个调查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要弄清：第一，综合性知识情况怎样？因为综合性知识表明学生的总的政治眼界和一般发展水平。第二，正字法，计算技术，几何学等方面的形式技巧怎样。通过这个调查，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我们要看看全部四个组的学生的综合性知识的情况怎样，那么可以说，尽管在这方面有着一系列的缺点，学生的综合性知识总的看来是令人满意的。在按班级分析这份材料时，调查报告指出，在某个班里社会科学知识掌握得较差，在某个班里自然科学知识掌握得不太好，等等，但整个说来，特别是在高年级，情况是令人满意的。而这里如果我们看看技巧的情况，那么，应该毫不隐晦地说，情况糟透啦。

我不准备向你们引证卡那也夫和贝科多罗夫的书中大量的材料，我只举第一组和第四组学生的正字法知识为例。在第一组的学生中，只有二十一个人，或者说是百分之三点一的人书写得

没有错误。所有被调查的第一组的学生，在书写二十四个单词组成的十个句子时，共出了两千五百八十个错，平均每个学生有四个错误。在第四组，成绩也是这样的：写得好的，也就是说没有错误的，只占有所有学生的百分之四点一，中等正常的占百分之四十一·五，其余百分之五十四·四则是比较差。

作者们作了这样的总的结论：“百分之三十二的毕业生书写错误严重，要犯十一到四十一个错误”。

在这本书里，画有一个统计图，在这个图里，一条线表明知识，另一条线表明技巧。结果是，“学校的剪刀差”即综合性知识向上升，形式技巧往下落。这个调查的作者作了以下的总的结论：“如果把所有形式技巧都合并成一条曲线，并把它和知识曲线对照，那末，我们就会得到技巧同知识十分悬殊的剪刀差。”

作者们接着指出：“在这种形式技巧低水平的情况下，农村学校不能提供完全合乎条件的人材。”作者们补充道：“关于技巧和知识结合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农村学校的现实问题，也可能是城市学校的现实问题。”同志们，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结论是不是正确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一大批的城市教育工作者。我的个人观察说明，可能这些结论基本上也适用于城市学校。

我们所引证的这本书的作者们，根据调查材料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法意见。这个意见就是：“教师们经常抱怨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巩固技巧，却总是力图教完所有的综合性材料，这样，为了综合性知识而放弃了技巧。应尽可能在小学里妥善地处理好这些在我们这儿还处于脱节现象的方面。”这里，我且不涉及这个问题的实质，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问题的本身有着实际的意义，我们的教学法机关和教育科学研究所，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教

（下转第 76 页）

## 中国事变的回忆

〔日〕今井武夫

编者按：“七七”事变前后直至日本投降为止，今井武夫先后充当日驻华使馆副武官助理、日本侵华派遣军参谋、副总参谋长等职，直接参与了侵华活动。本文是今井武夫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回忆录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汪精卫、蒋介石之流卖国投降的丑态。

### 汪精卫到达上海和赴日

汪精卫同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住到河内西北八十公里避暑地三岛的旅馆里去以后，再三向重庆政府建议和平。

国民政府派出许多特工人员威胁汪的安全，法越当局也对汪渐趋冷淡，因此汪的活动逐渐困难起来。而且，他所依赖为左右手的曾仲鸣，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深夜，在汪的秘密住所里，正当熟睡在汪的隔壁房间中的时候，受到了重庆政府派遣特务的袭击，成了汪的替身被暗杀了。

在这以前的一月十九日，林柏生在香港被暴徒袭击受伤，几乎瞎了眼睛。汪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也被暗杀。日本方面所预先拟定的汪的和平运动的参加者何应钦、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陈寿农等军政界要人接到汪派通知以后，不仅没有任何

发动的迹象，而且就连一向视为汪派的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也不敢赞同汪的主张。这时，汪本人不能不感觉到他的估计错误了。

因此，汪精卫决心逃出情势紧迫的河内，寻找安身的地方。

那时我正留在香港。一月十五日曾一度奉命返回东京。二月上旬为了协助土肥原中将与从事孔祥熙的工作，往返上海之后，于二月二十六日将高宗武和周隆庠接到东京，在箱根富士屋听取汪精卫派的内部情况，协商了今后的进行要点。

三月上旬，为了再次向土肥原中将报告吴佩孚工作情况，我出差到北京。十二日回到东京。在我离开东京期间，被晋升为大佐，意外地被新任为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并和前课长渡左近大佐交换了职位。

因此，卸任了军务课长而能自由行动的影佐大佐，被派到河内去营救汪精卫。

影佐一行除伊藤、犬养外，还增加了外务书记官矢野征记。影佐和犬养于四月八日乘山下轮船公司“北光丸”，从三池港开出，十六日到达海防。十八日访问汪，同汪协商之后，决定逃到上海去。

汪假称下野出国，前往新加坡，求得法越当局的谅解。二十五日黑夜逃出河内，雇了一只七百五十吨的小船“风安号”，驶出了风光明媚的、并以鸿基煤出名的下龙湾。

原来的计划是，第二天即二十六日，在航海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后一同航行，但两只船联络不上，汪乘的船一时不知下落，使搭乘在“北光丸”上的人大伤脑筋。隔了一天，到二十八日下午，两只船总算在汕头海面上相逢，这才放了心。汪一行在海上改乘了“北光丸”。

以后，该船在基隆作短暂停泊，于五月六日到达上海。汪则

在八日登岸。我到上海去迎接，六日在船上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汪身躯硕大，容颜白晰，作着手势，首先托我向日本政府取得联系，并说出大意如下的谈话：

1. 汪反驳国民政府的抗日理论，宣称只有和平才能挽救日华两国，从外部推动政府改变政策，不易收到实效。今后考虑百尺竿头需更进一步，自己建立和平政府，使日华提携成为现实，要给一般国民证明抗战是毫无意义之举。

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行近卫第三次声明，使四亿中国民众知晓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

2. 和平政府建立后，当然也要编成军队，但丝毫没有用来同重庆政府作战而引起内战的意向。最终的目的是，坚决使重庆政府的抗日主张转向和平。

从而将来重庆政府与和平政府合并时，即认为本人的运动已达到目的，本人预定下野。

3. 为了建立和平政府，首先亲自赴日，同日本当权的人士交换意见，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

4. 万一决定建立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

从而还都建立政府，采用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关于上述谈话中采用青天白日旗的问题，周佛海和梅思平在另一次会议上对我明白表示，万一日本军提出强烈反对意见，不得已也可考虑用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配合而成或者是其他设想。但到半夜一点多钟的时候，周、梅慌慌张张跑到我的宿舍来，说受了汪严厉斥责，取消前言，提出更正：国旗绝对不能改为青天白日旗以外的旗帜。根据这点来看，可以明了选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一事，在汪的心中，与其说是非同寻常的希望，毋

宁说是一种信念。

我从汪那里听到了上述的计划和腹稿以后，急忙回到东京，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次长提出报告。大多数人对汪的赴日，起初是有点踌躇的，但经过讨论后，陆军固不待言，即使政府方面也容纳了汪的要求，决定在东京接待他。

五月三十一日，汪精卫从上海乘海军飞机到达追滨的海军飞机场。这一行中，除汪以外，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一人，日本方面由影佐、犬养、矢野等为东道主。

在东京，以泷川的古河从纯的别墅作为汪的住所，一部分随员则分住在麻布的池田成彬的别墅里。

这年一月初，日本政府因近卫内阁总辞职更迭为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汪从六月十日起就开始同平沼首相、陆军、海军、外务、大藏各大臣以及近卫前首相进行会谈。

平沼首相开诚布公地说，日华合作应以道义为基础予以实现。汪表示他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同志，计划在南京成立和平方针的国民政府。对此，首相保证日本政府将坚决予以支持。

汪又同板垣陆相就现已成立的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的处理问题、制定国旗问题以及在建立政府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磋商。汪毫不退让地坚决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而且表示临时政府可暂作别论，但维新政府则必须取消。

在日本政府同汪精卫进行这些会谈之前，陆军已从六月二日起把在华各军的参谋将佐召集到东京开会，经过种种研究议论之后，决定同意汪的要求，共同协作。仅对制定国旗问题多少有所分歧，但最后作为中国的国内问题，尊重汪的意见，各军亦暂以此方针予以援助。

这时我对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府的设想，担心它的成果，并

不怎么表示赞同。

本来在重光堂会谈中，高宗武主张在建立政权时，要避开日本军占领地区，竭力选择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日本军未占领地区，由汪派军队加以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和平政府。但是，现在突然又改变方针，进而在日本军占领区内的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就堕落成为所谓傀儡政权，与以前的临时、维新两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对解决事变果真能有所贡献？或者反而会成为全面和平的障碍？一概都不明了，大有研究的必要。纵然有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对重庆方面可以作些工作，促使他们改变抗战政策，但是汪政权自身即成为傀儡政权，连他本人也将被称为卖国贼而为国民大众所厌弃，殷鉴不远，有再蹈北京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和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的覆辙之虞。因此我在上海听到汪的腹稿时，事出意外，使我为之一惊，我曾表明了我的一些想法，同周佛海、梅思平进行了讨论。

但是要这么做，日本军就必须对重庆军进行牵制攻击，可又得不到作战当局的同意，同时，汪派所期望龙云军或张发奎军的响应已成绝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日本军未占领地区建立和平政府的主张无论如何是不能实现的。如果强加主张，结果势必打消建立政权的念头。当汪在上海登岸之后，他的政治生命已岌岌可危，如使他的壮举成为无意义之举，这就完全辜负了他对日本的信任。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只好改变了想法，要使汪精卫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在建立政府之后，努力寻找一切办法，使重庆政府改变抗战政策，在机会到来时，只要不成为两个政府合并的障碍，虽然难以称为上策，也必须视为中策。所以我相信中国革命元勋和伟大人物的汪的见识，姑且听从了他的话。

但是，在驻外各军参谋会议上，平素容易对细节产生异论的

各军参谋，竟然不顾会议内容的重要性，毫不计较，几乎无条件地顺从了这一决定，简直使我感到意外。

细想起来，我军在芦沟桥事变爆发之初，对中国的实情不深入调查，只为满洲事变六年来已渐趋平静、渐趋安定的倾向所惑，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仍然可照过去那样用恫吓政策来解决对华问题，于是漫不经心地犯下了诉诸武力的错误。

从而，正如日本政府最初命名为“北支事变”不久，又改称“支那事变”所象征的那样，违反了用兵的根本原则，逐次投入兵力，不断为敌情所左右，零零星星地扩大作战，这些都暴露了不宣而战的内在矛盾。

特别是攻占南京这一事，曾作为解决事变的转机而寄予最大的期望，但却是毫无作为，从那以后，或是徐州作战，或是攻下武汉，乃至进击广州，始终抓不住解决事变的头绪，只不过徒然扩大战局，一味增加兵力，使任何人都有泥足深陷的感觉，这才觉悟到单靠作战的手段，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解决事变的指望。

这时，出乎意外地汪精卫跳了出来，他提出要在南京建立和平政府以为解决时局的方策，老实说，纵然没有象在地狱里遇见菩萨那样的信任心，也有在渡口遇着船时的安慰感。

建立政权的方案，就在这样会议的气氛中决定了，同时，选定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的问题，也很容易地通过了，只是为易于识别重庆抗战政府军与和平政府军起见，依照汪精卫的提议，暂时把写有反共、和平、建国三原则中任何两项的黄色三角布片附在旗竿的顶端。驻外各军也兴致勃勃地宣誓协作。

到了东京的汪精卫同日本政府协商完毕后，对在南京建立和平政府一事取得了确实援助的保证，就在六月二十日，除了影佐、犬养、矢野等以外，又新加上了须贺彦次郎海军大佐、清水董三郎外务书记官等，一同从芝浦乘船出发，在塘沽港登岸，进入

了天津的意大利租界。

二十七日，汪精卫从天津到北京访问，会见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大将和临时政府主席王克敏，重新坚定了建立和平政府的决心，同时认识了华北形势的复杂性。

汪在北京时，依照日本军的劝告，曾经企图会见直隶军阀的元老吴佩孚，但在两人会见的程序上，双方意见不能融洽，汪就中止会见，即日返回了天津。

### 铃木和宋的香港会见

从本质上来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是最终目的。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段。

从昭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九年——译者）秋季以来，在同汪精卫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同时，我另行努力开辟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当时，日本海军全面封锁了大陆沿海。香港已成为重庆政府唯一的对外联络线的基地，成为各种机关和要人的集中地点。因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昭和十四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制定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铃木由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提出要和宋子良会见。但宋表示：政治行动必须特别得到其兄宋子文的承认，以此为理由，一度予以拒绝。但到了十二月下旬，又表示希望会面。铃木认为：宋起先回绝，后来又要求会面，这种态度大概是反映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事实上，宋子良也说他显然没有对日谈判之类的政治权限，

但因为他充分得到宋美龄的支持，可以暗中活动，把日华两国政府的意向向双方转达，使联络易于进行。

宋子良以前做过广东省财政厅长，当时以西南运输公司主任的名义，住在香港。

铃木同宋子良来往了几次。在由宋提议的第一次会谈时，宋表示了如下的要点。

“倘使日本是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的，重庆政府有和平会谈的准备，因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汪精卫政府之前，认真同重庆政府协商。

“中国方面为了和平是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于中调停的，但不拘怎样，日华两国在开始谈判前，必须休战，而且日本必须保证撤兵。”

接着在第二次、第三次会谈中，宋听了铃木的说明，表示已经消除了一个误解，把昭和十三年底的近卫第三次声明，仅当作日本政府的一个宣传姿态，并同意这是日本国策实际上决定了的事情。因此，约定于最近赴重庆，通过宋美龄转达给蒋介石，但强调说，重庆政府同汪精卫合作这类事是绝对难以设想的。

铃木回答说：

“日华和平应排除第三国介入，由两国直接谈判；而且，重庆政府同汪精卫的关系，中国方面如能照顾到日本对汪的道义，可以作为中国内部的问题，听任双方直接协议，妥善处理。”

铃木还提议：

“迅速派遣能够负责重庆政府中枢政策的秘密代表来香港，同日本方面的秘密代表互相开诚布公地会谈，如此自然可以消除误解，发现某些打开局面的方策。”

宋又在二月九日回到香港，他自称在二月五日到达重庆，向蒋介石等首脑说明了以往的原委，在最高国防会议上研究了对于

策之后，带回来一个决定的方案。

据他说，重庆政府有派遣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到香港，同日方代表进行秘密会谈的打算。

这时，汪精卫建立和平政府的准备工作已在逐渐进行中，在青岛，同临时、维新两政府首脑的会谈已经结束，而且，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已把日本同汪派之间所谓秘密试行方案暴露了出来，因此，宋说：

“抗日和反汪精卫的气氛在重庆显著高涨，再则，由于日本的对汪工作强烈地刺激了美国，使美国恶化了对日感情，政府中一部分人反而有高兴的倾向。”

我在青岛会谈后回到南京，应铃木的要求，二月十日从南京出发，经过广州匆匆到了澳门，铃木中佐到该地迎接，二月十四日结伴进入香港。

为了保守秘密，对外我仍照以前一样，用满铁工作人员佐藤正的名义，住进了铃木中佐的宿舍。后来，在台湾拓殖公司经营的东肥洋行会客室中，才第一次把自称为宋子良的那人介绍给我。我们是初次见面，他果真是宋本人吗？当然不可能断定。这人四十岁左右，白皮肤，身材不高，英语流利，手里时常拿着雪茄烟，态度很有礼貌。

宋子良同铃木的居间人张治平，当年我在北京大使馆武官室任职时，他就在冀东政府工作，曾经是北京的新闻记者，这次的奇遇使我吃了一惊。不过原来只是相识，我毫不了解他的历史和性格等。当时，宋的建议是这样的：

“希望在举行日华两国政府正式和平会谈前，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秘密代表各三人的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重庆政府对于这次的秘密讨论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它的代表都携带着委任状。同时，宋美龄也预定前来香港，从侧面进

行援助。”

我在会见后的第二天即十六日，立即从香港出发，乘轻轰炸机经过广州、台北，十七日回到南京，向总司令官西尾大将报告了详细情形。二月十九日秘密到东京，向参谋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作了报告。同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协商后，决定同意中国方面提议的举行圆桌预备会谈。二十一日，由参谋次长上奏天皇。

大本营派第八课长白井茂树大佐，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加派铃木和我为这次会谈的日本方面的代表，共三个人。

这次和平路线命名为“桐”工作。根据指示，日本方面的谈判条件以去年十一月底御前会议所决定的日华新关系调整重要条款为基准，因此，是以同日本方面建立汪精卫政权所提议的内容相同的条件进行的一次谈判。

## 香港会谈

二月二十八日，我从南京出发，三月一日从上海乘飞机到广州，从该地乘轮船“海珠丸”到澳门，四日到达香港。白井大佐从东京乘美国轮船“柯立芝总统号”起程，本来预定于五日到达香港，但在海上遇着浓雾，延期于八日才到达。中国方面除自称的宋子良以外，以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前驻德大使馆参事、现任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为委员，以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员，以张治平为联络员，派遣到香港。三月二日全体到达。

另外，宋美龄在五日到达香港，从侧面支援中国方面的代表。会议的结果除利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立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港和重庆之间，对方夸耀说，在第二天会议之前

即可得到政府中枢部门的指示。预备员张汉年说成是在会场附近暗中担任警卫任务，但始终没有露面。

七日以后，每天大约从下午九时到深夜，在东肥洋行二楼举行会议。第一天，因为白井乘的船未到，主要是座谈，八日起全部人员到齐才进行会谈。

日本方面出示了陆军大臣畑的保证书，中国方面只有陈超霖、章友三两人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相互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后开始讨论。到第二天九日深夜暂时停止，十日整理文件，会谈完毕。

在会谈中，中国方面主要由章友三发言，对主要问题一一征求陈超霖的同意，宋子良专事从中斡旋，三人中给人的印象是，真正的实力者好象是陈。

在这期间，日本方面有总司令部特派人员坂田诚盛跟华南秘密结社的洪门致公堂保持着密切的联络，由于他们的频繁活动，所以机场和轮船码头等重要地点都有人监视。而且他留宿在陈、章住宿的同一个大饭店里，和中国方面代表的房间隔着一道走廊，从正对面的房间监视着他们的动静，此外，让启德机场的中国人主任送来每天上下飞机的人员名单。

结果知道，他们每晚从会场回去后，不论怎样迟，立刻全体集合在一个房间里，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协商后，派联络员到机场，乘深夜开出的飞机同重庆联络。此外，报纸上也登出宋美龄到达香港的消息，所以我们相信中国方面的说明。

七日晚，在第一次会谈时，首先由日本方面发言：

“此次会谈在于研究召开日华和平会议的可能性。关于和平条件，只研究它的大纲，即使双方意见不一致时，也希望理解相互的主张，避免决裂，使经过再研究之后重行调整意见，尽可能努力做到召开正式会议。”

中国方面表示了希望说：“从重庆出发前，蒋介石特别注意下列三事，但愿日本方面也务必协作：

1. 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2. 明确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
3. 必须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

在以后约一小时的商谈时，我同中国方面的代表有如下的对答：

今井：“中国必须停止抗日。”

章：“当然。”

今井：“中国应该承认满洲国。”

章：“希望作为日华两国的保护国。”

今井：“满洲国现在已是名正言顺的独立国，因此，没有作为保护国的必要。”

章：“希望保留这点。”

今井：“希望缔结日华两国的防共协定。”

章：“可以。”

今井：“日本军撤兵后，有在特定地点驻扎日本军的必要。”

章：“这会使国论沸腾，不能应允。以在和平成立后另行谈判为好。”

陈：“在不得已和必要的地方，可以延迟日本军的撤兵。”

今井：“为了防共，内蒙有作为特殊地区的必要。”

章：“可以。”

今井：“华北和长江下游地区，有作为日华经济合作地带的必要。”

章：“如果以‘中国为主、日本为从’是可以的。”

陈：“希望考虑在长江一带有各国利权的的关系。”

今井：“当开发华北资源时，希望特别为利用日本的技术提

供便利。”

章：“可以。”

第二天，即从八日下午九时起，日本方面新加入了白井进行会谈，午夜十二时结束。

今井：“为了日华提携，中国应给予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权。日本考虑废除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

章：“当然。”

今井：“中国应从日本招聘财政、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技术顾问。”

章：“可以。”

今井：“中国应承认满洲国。”

章：“希望今天保留。”

今井：“中国应承认日本军的防共驻兵。这回撤兵问题应有区别的必要时。”

章：“中国已在努力讨伐共匪，因此，防共问题可以听任中国去办。”

今井：“不是国内的共匪问题，而是为了对外的军备。”

宋：“‘驻兵’这一个词不适当。把撤兵期间延长也可以吧？”

白井：“如果把研究驻兵的细节作为秘密协定也可以吧？”

章：“‘驻兵’两字危害国民政府，秘密协定可以考虑。”

今井：“发表防共协定，以‘驻兵’作为秘密协定如何？”

章：“原则上可以。”

今井：“另外没有意见吗？”

宋：“不造成会议的障碍是必要的。”

章：“日本方面没有意见吗？”

今井：“对汪精卫问题，贵方的意见如何？”

章：“这是我方掌管以外的事情。希望知道日本方面的意

见。”

今井：“日本对汪有道义关系，所以希望重庆方面同汪派协商合并。”

章：“反对汪精卫是全体国民的意见，因此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前，建立日华和平是必要的。”

臼井：“首先日华停战，其次再开重庆和汪派合并会议也可以吧？”

宋：“必须不造成日华停战的障碍。”

今井：“因此要迅速使谈判成功。”

章：“同意。今天到此结束吗？”

今井：“结束了。明晚整理条文，后天作成备忘录。”

章：“可以。”

九日，日本方面预先把日华协议的结果作成备忘录，交给中国方面代表。会议从下午九时开始。

今井：“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怎样了？”

章：“满洲国的独立作为既成事实，现在没有再加干涉的意图，希望暂不触及到这个问题。”

宋：“所谓缄默态度。如果解决和平，四、五年后总可以解决吧？”

张治平：“现在承认将招致国际上的误解，政府将失去国民的信赖，希望研究办法。”

章：“重庆也有各种系统的军队，如果现在承认，形势将要恶化。我们还要听候最高当局的指示，在正式代表会议上再行决定如何？”

今井：“在日本方面，这是最紧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谈不出解决的办法，召开正式代表会议也是困难的。”

章：“我们明晚飞重庆，四天以后可以回答。”

今井：“我们也是后天回东京，要看贵方回答的结果，再行决定派遣正式的代表。”

在举行这次会议的第二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八日上午，张治平特别要求会见铃木中佐，面交了一个备忘录，内容是：

“根据昨夜蒋介石派来的特使，得知日本军中的某人在上海对中国新闻记者暴露了这次香港会议，这就严重地违反了会议开始前的约定，因此希望谋求严加取缔的手段。”

特别指出了另行开拓重庆工作路线的个别人的姓名，提出强硬抗议。不仅如此，到了午后，又有宋子良来访，尖锐地指责日本军的背信行为。

中国方面惧怕暴露这次会议，似乎是为了对国内各党派的警惕，特别是对共产党的警惕，有超出我们想象之处。甚至还漏出了一种口风，认为根据日本方面对此次抗议的处理来看，怀疑这是日本方面的计谋。

我们总是对日本方面的保守秘密不够重视，感到为难，只好立即打电报到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部，指出对泄密的那个人，请求取缔；同时向中国方面保证，今后严加管束，并致歉意，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由于有了上述意外事件，激怒了中 国，一时对谈判前途完全陷于悲观。但是，中国方面似乎也逐渐理解了我方的诚意，这次会谈，在整个四天的会议中，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大体上能够在谈笑声中交换了意见。只是在这个期间内，始终成为争论的中心、结果不能得出结论的事情，依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军的部分驻兵问题，再有就是汪精卫政府的处理问题，其中最成为难题的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

中国方面关于这些主要问题的论点，在上述对答的记载中已大略明了，加以整理，概要如下：

1. 关于满洲国，主张日华两国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作为它的保护国。

对于日本方面的反对，保留答复，在询问重庆以后，中国避免再触及这个问题，目前以默认的态度进行。

其所持理由：满洲国在现实上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不触及这个问题，对日本当无任何实际害处。但是中国如果一旦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当然是在预料之中，可以毫不介意。但在国民党内有旧东北系和旧西北系等强硬的坚定反对者，就难免引起国民党的分裂，造成国内大乱的局面，因而，对此问题以暂不着手为宜。

谈到这个问题时，对方说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特别使人难忘。据说：满洲国的独立，在中国看来，好象一个不贞之妻投奔到奸夫那里去，从而，逼迫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就等于迫使本夫正式承认奸夫和她两人结婚。

本夫既已默认而不坚持异议，即使不再发给结婚书，但随着时日的推移不是就自然解决了吗？

2. 关于日华共同防共，中国原则上可以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和把内蒙地区特殊化，但绝对不能承认部分日本军驻扎在华北。万一日华两国国防上有必要时，可以推迟一部分撤兵，说到底，就是在解决和平后可以另行协商。

3. 关于汪精卫问题，由于汪逃出重庆，中国国内的反汪空气随即愈加高涨，在这样情况下，要重庆政府和他合并，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考虑的问题。

但是对日本政府的立场也予以谅解，因此勉强把这作为中国国内问题研究并妥善处理。

虽然残留了以上这样的争论点，但到九日夜间，双方的讨论总算暂且告一段落，以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草案为基础，中国

方面加以订正，大体上可望作成两国代表所同意的东西。

### 备 忘 录

日华两国为确保东亚之永久和平，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缔结和平条约之基础，为迅速停战和调整邦交起见，双方认为必须协商，经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条 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恢复和平后），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不干涉其内政。

第二条 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

第三条 日华两国为实现共同防共，缔结防共协定。而其原则与内容，以及日本要求在内蒙与华北之若干地区于一定期间驻扎所需要之军队，以秘密条约缔定之。（本条款于恢复和平后进行协商）

第四条 在华北与长江下游地区，应取得日华经济合作之成就。关于华北重要资源，中国应对日本提供便利，共同开发。（中国自然居于主人地位）

第五条 日华两国保证承认日华两国国民在两国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考虑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与交还租界。

第六条 为了日华提携合作，中国向日本招聘军事和经济顾问。

第七条 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派协力合作。

第八条 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回派遣至中国之兵力。与此同时，中国确保各地区之治安，并保证条约之执行。

第二天，三月十日正午稍过，联络员张治平特意来访铃木中

佐，带来了好消息。

“中国方面昨夜通宵协商之后，决定基本上同意上述备忘录，已向重庆政府请示。”日本方面代表都为这一成功高兴。

但到了规定的下午九时，日华双方代表开始进行预定的会谈时，中国方面代表开头就说：

“今天上午十一时，收到蒋委员长发来的长篇训令，整理电文一直到傍晚。”并兴奋地提出了根据重庆新训令的和平意见，提议说：

“希望日本方面在前一天的备忘录上，中国方面在这个和平意见上，各自分别签字。”

日本方面代表反驳说：

“备忘录正是日华两国代表经过三天讨论的结果，好不容易才取得的一致意见，所以日华两国代表应该一齐在这上面签字。”双方的意见互不让步，但结果，中国方面代表作为当事人，也不好表示不同意，只得保证说，火速回到重庆去，把本会议的气氛以及日本方面不存私心的主张向蒋委员长等报告，在内部努力作到承认这一个备忘录，双方分别接受了文件。

这时，白井大佐表示，日本方面希望把海南岛设置为海军基地，供日华两国海上防御使用，征求谅解。

为了了解当时重庆的气氛，记下中国方面提议的和平意见如下：

### 和平意见(中国代表)

中华民国和日本帝国为谋确保东亚之永久和平，基于尊重中国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原则上结束中日战事之研究，兹经详细协商后获得之结论如下：

第一条 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

式如何另详商议之；

第二条 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此条应包括在第三条范围内）；

第三条 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

第四条 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原则上同意，但资源开发中国应自处于主权地位；

第五条 关于日华两国臣民居住营业自由的问题，绝对同意，同时日本帝国应考虑取消在中华民国之治外法权及租界地；

第六条 关于顾问问题，中日两国为提携合作，如中国需要技术顾问时，得聘请日本帝国之军事及经济专家为顾问，但不得干涉中国之内政；

第七条 关于汪精卫问题，此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汪氏与国民党历史之关系，中国当有适当处置之权，毋庸作为和平条件之一；

第八条 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帝国应于和平妥协时将在华军队从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所借口延迟撤退，至各地方治安，由中国政府维持之（撤兵步骤另细订之）。

附则：

以上意见日本帝国不得视中华民国为被征服国。中日两国应立于平等立场，以最高诚意的公平互让为结束战事之基案。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日

这样，长达四天的会议告终。中国方面提议，以后正式停战会议避免在香港，另行选定在马尼拉等第三国进行，对此意见一致。中国代表宋子良在十一日上午二时，陈超霖和章友三在第

二天十二日上午二时，先后乘香港起飞的飞机赴重庆。宋约定至迟在一星期以内携带正式答复返回香港。

日本方面代表把铃木中佐留在香港，负责同中国方面的联络，我和白井于十一日乘香港出发的轮船经过澳门、广州，乘飞机到台北，十三日回南京，白井在十四日回到东京，各自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陆军军部报告，然后等待将从重庆发出的正式回答。

## 第二次会谈的预备

虽然，板垣总参谋长是这次预备会谈的最积极的支持者，是第一个衷心希望它成功的人，但只要一谈到满洲问题，他就坚决主张中国政府应该正式承认满洲国这一条件，始终不肯妥协。他说：“所谓承认满洲国，不过是五个字罢了。连这点事情都不能使重庆让步吗？”

满洲国建国是这位将军的毕生事业，若把他过去的经历回顾一下，再把近来汪精卫同日本方面谈判密约时，主动承认日方提案这些实际成绩来看的话，无论从当时日本的国策上来考虑，或从这位将军的感情上来考虑，都不能说是无理之举，我只有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深为叹息罢了。

我在南京等待宋子良给香港的答复，但总不见送到。在这期间，以汪精卫为首参加南京政府的要人，从上海及其他各地来到南京，预定成立和平政府的日子已近在眼前。总司令部不得已决定以延期四天为限，三月十九日征得汪精卫的同意，把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延期到三月三十日举行。

到三月二十四日，等待已久的答复才从重庆送给香港的铃木，内容是：“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对立，

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四月十五日再作确定答复。”虽然好不容易才取得联系，而终于辜负了我们的期望。

另一方面，成立南京政府的准备工作，也已日益成熟，影佐少将提出，如果再行延期，可能会引起参加政府的人的动摇，甚至有解散的危险。既已预先作了延期限制，就该清算一切曲折。于是，在三月三十日早春微寒的阳光之下，以远近象潮水一样的街上的嘈杂声作为伴奏，举行了国民政府的还都仪式。

一个月以后，即四月十一日，宋子良从重庆回到香港，表示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方案，再三催促铃木中佐，请求再次举行预备会谈。

到五月七日，接到章友三也从重庆到了香港的确实消息，我也在十一日从南京赴香港，同时报纸报道宋美龄也来港治疗牙病。

我和铃木中佐、特派员坂田三人从五月十三日下午九时起，在九龙半岛旅馆二四三号室内会见了章友三和宋子良两人。

会谈时，章说：“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以及日本军部分驻兵问题，可以说是当前和平的困难问题，如果暂时搁置一下，留待日华和平恢复后再进行谈判，即使对汪精卫政府的善后问题多少有些困难，可预料不会成为决定性的障碍。所以，只要秘密预备会谈能取得日华双方同意的成果，按照预定，日华两军实行停战，同时重庆政府发表反共声明，希望在六月上旬以前，由上次同样的人员在澳门举行第二次会谈。

“如果举行正式会谈，重庆政府准备派遣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或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

然而，当时关于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军部分驻兵问题，在实际上日本军是看不出任何解决的曙光的。尽管我们在内部不断的努力，而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内关于满洲国问题，在参

谋本部的作战部内关于驻兵问题，强硬论是根深蒂固的，不容易收敛下去，甚至连缓和的征兆都没有。

为了这次旅行，当我在五月九日从南京出发之前，作为最后努力，向板垣总参谋长陈述了缓和日本方面要求的意见，终于未被采纳，甚至硬性规定中国应承认满洲国这一条款，不论秘密会谈能否成功，是日本的绝对要求。

因此，我在半岛旅馆会谈中对中国方面一再反复主张，尽可能省略秘密预备会谈，应该研究一举达成巨头会谈的召开。

总之，照我们的想法，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确为日本方面的强硬要求。万一中国政府反对这个要求，不正式承认满洲国，但那已是既成事实，对日本说来，那是没有实际损害的问题，不过是形式问题。因此我们判断，多少带有乐观想法的强硬论者，如果自己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到了和平谈判成功与否的最后关头，也不致于以会议的决裂为赌注固执下去吧。我想如果能设法做到召开巨头会议，是一定能够解决的。

还有，日本军在中国部分的驻兵问题，既然中国方面承认在秘密条约中予以考虑，我想，日华双方本着互让妥协的精神，也不见得作战部的意见就得不到满足。

但是，照中国方面的想法，一旦召开巨头会议，不论会议成功与否，单是召开会议这一事实，就将给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强硬派一个口实，掀起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并发展成为内战，这是一目了然的，因此，要是召开巨头会议，必须以签定协定为前提，必须在整顿好讨伐共产党的态势之后才行。

换句话说，在召开巨头会议后，即使内容不能使中国满意，但除了承认日本提出的方案以外别无其他方法，所以他们主张，只要在秘密会谈中对日本的最后方案还没有确实保证以前，就不能下决心召开巨头会议。

第二天，即十七日夜，从晚上八点半起，我应宋子良的邀请，为了保守秘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香港南岸的仔庐山酒家晚餐，然后乘小艇在海上交换意见。宋说了一番吐露内部机密的话，谈他在重庆为了推进和平，费了非同小可的苦心 and 经营，甚至坦白地说出，在万一的场合，他决心采取非常手段作为最后的办法，表露了他个人的热情。

他私下里说：“关于蒋介石委员长，表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谈的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在第一条和第三条上同意中国方面的意见，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

“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

“秘密会谈如果成功，当然要讨伐共产党。已经制订了讨共计划，如果可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经集中在重庆协议完毕。因此，和平恢复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补充武器等援助。”

“从而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所以，希望在第二次秘密会谈中，能从时机到内容的各方面同日本协商。”

“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元凶冯玉祥，已准备用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如不得已时，考虑到用最后的强硬手段。”

在这次海上会谈中，我们对第二次召开秘密预备会谈，意见大体一致，商洽就此结束。

## 澳门会谈

在香港，同日本方面会谈完毕的宋子良和章友三一度返回重庆，再三向香港的铃木表示，希望六月四日起在澳门召开第二

次预备会谈，日本方面也同意了。日华双方代表决定，由三月间香港第一次会谈时同样的人员参加，我们日本方面除臼井大佐、铃木中佐和我三人以外，以总司令部的内之宫中尉为翻译。六月三日在广州集中，四日下午五时乘“白银丸”雨中到达澳门。为了避免一般人的注意，各人分别住宿。

这次的会议场所一切都由中国方面筹备布置，好象是特别为了保密，在澳门市郊海岸大路上的行人极为稀少的地方，临时租了一所空房子。

在会谈当天的下午九时，张治平来迎接我们日本方面的代表，用他们的汽车送我们到达会场，中途一度下车，在完全没有行人的黑暗的路上转弯抹角地走了一些路，最后才算到了象凶宅一样的会场。一进门，立即被领进地下室，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桌子，桌子上以适当的间隔点燃了四支蜡烛，桌子两边放了椅子，日华双方代表分别在两边对面坐下。

房屋的周围有张汉年在监视，但看不出特别警戒的样子。整座房子里的其他房间没有一点声音，静悄悄地好象没有人。从这一天开始，共有三天时间，每天从同一时刻到半夜，不断地交换意见。第一天首先互相出示委任状，表明身分。

日本方面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委任状，中国方面出示的委任状，内有委员长蒋介石的签名，在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盖了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的小印。

在这个委任状上写着中国代表三人的姓名，但自称宋子良的却用了宋士杰的姓名。宋解释了自己不用宋子良的姓名而使用别名的理由。

会谈一开始，陈超霖好象迫不及待地要求首先发言，毅然站起身来，拿出预先准备好的书面材料，就香港第一次预备会谈后重庆的一般形势，大声宣读。首先读了前言：

“蒋介石委员长最初对会谈表示怀疑，为了确实了解日本方面的诚意，允许陈、章等参加香港会谈，结果相信和平亦有可能，始决心实现和平。”

接着读了如下的正文：

“在第一次香港会谈中，关于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军在中国驻兵问题，日华双方意见不一致，以致不能达成实质性的效果，实属遗憾，但另一方面不能不确认下列五项已收到的巨大效果。

1. 以往日华两国间的心愿互不疏通，至今不理解，但香港会谈的结果，两国隔阂显著缩小，中国可以相信同日本已有接近的可能性。

2. 中国的青年将领，一向不能消除日本企图完全征服中国的观念，但这次得以了解日本的诚意，因此，考虑了今后实现和平组织的方案，赞同积极地推进日华和平。

3. 以往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时刻都抱有怀疑，认为日本言行不一，总在考虑不轨的举动，因此每次提出和平问题时，蒋委员长都加以拒绝。香港会谈后，始恢复了信任，得知解决事变完全在板垣参谋总长的双肩之上。因而，尽管许多和平路线都被拒绝，而认为我们这次的路线是最确实可信，且系最短的捷径。

4. 中国共产党预感和平到来时，国民党将立即企图发动剿灭共产党的战争，因而企图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尽可能扩张势力。因此，国民党各要人于香港会谈后，对防共方针的意见，愈加一致。蒋委员长也派了几名有魄力的军政要人到西北，防止共产党的反抗。中国的防共对策已开始逐步实行。

5. 反对和平的急先锋冯玉祥及其他将领，已于五月二

十八日商定，得悉他们也有和平的意思，日本的条件如不苛刻，可知他们亦不反对和平。”

陈的发言完了之后，我表示从日本方面来说，香港会谈时的条件没有变化。然后，此次会谈以香港会谈的备忘录为基础，双方再度交换意见。

中国方面先发言，章说：

“中国对备忘录第一和第三条，即承认满洲国和日本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日本方面如能充分予以谅解，希望今天就汪精卫问题进行讨论。”

他极力论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在日本方面斡旋之下，汪或是出国或是隐退。但日本方面反对。

这夜的会谈结束后，宋在上午三时匆匆乘澳门开出的联络船去香港，同重庆来的要人会见，接受了训令又回到澳门。从当时他们的言行推测，再从报纸上人事往来栏考虑，传闻这个要人大概就是宋美龄。

第二天，五日，从下午八时半起开会，就处理汪精卫问题，章友三继续昨天发言。会谈内容是以汪隐退外游为最上策，但如有困难，可以派遣适当人物为蒋介石的代表，同汪协商后再作决定。

接着，关于第一次会谈的备忘录的第三条“缔结日华共同防共协定”，表示原则上同意，但强硬地主张，在和平会谈中不触及日本军驻兵问题，而在和平恢复后缔结防共协定时，希望作为军事秘密协定加以规定。

他的理由是，在和平会谈中，如果缔结日本军部分驻兵协定，难以取得国内将领的同意，并有刺激苏联之虞。

最后，中国方面主张，即使对防共驻兵有所谅解，但只能默契。日本方面主张，应在停战前确切约定。双方依然不能达成

协定。关于满洲国问题，日华双方只是反复了第一次会谈的主张，没有任何进展。

到第三天，六日下午二时，宋子良偕同张治平来到贝拉比斯特旅馆。

宋表示，关于这次会谈，他个人已尽了非常的努力，万一协定不能成立，将要受到巨大的打击，因此特别希望日本方面让步。从他这时的口吻来观察，他为了这一工作，私人下了本钱，经济上的打击似乎不小，但我们难于判断这种复杂的内部情况。他说：

“就中国承认满洲国和日本军防共驻兵问题，日本方面的主张同前次没有变动一事，已向重庆方面报告请示，但无需等待回示，也可料定此次日华意见取得一致是困难的。因此，希望今后的谈判，留待蒋介石的代表（预定为张群）派到上海等地同汪精卫会谈，解决了汪的处理问题，然后再由蒋介石同板垣中将在重庆进行会谈。”

据此，日本方面提议把上述的顺序颠倒过来，先进行蒋、板垣会谈如何。宋不同意。结果，一致同意板垣、蒋、汪三人进行会谈，日华两国代表保证，在此次会谈中努力解决全部问题。

到下午八时半，第三次到中国方面准备的会场去，进行最后的会谈。日本方面举出上海、香港、澳门等地，为板垣、蒋、汪三人的会谈场所，中国方面以蒋介石不可能出席为理由加以反对，希望在重庆或长沙。这样，只好等待双方听取国内意见进行研究后，再作决定。

日本方面又补充说：为了召开这次会议，中国方面如有怀疑不安，不妨以我们日本方面代表三人自愿作为人质，扣留在重庆。

此外，日本方面在香港会谈时所提出利用海南岛为日华两

国海军基地一案，也得到中国方面答复，认为可以在恢复和平后的条约中确定。

最后，作为三天会谈的成果，中国方面代表写成了下面这样的笔记，征求我们日本方面的同意。

### 第二次会谈的意见

此次会谈系基于第一次会谈后，双方意见大略了解，比较接近，但其中仍有不同之点，陈述如下：

根据贵方第一次会谈备忘录内第一、第三两条，经敝方研究考虑，确有不能接受者。因中日两国争端，其祸胎即因满洲问题所造成，而华北驻兵，亦为中日事件之祸根。兹为东亚永久和平，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故于可能范围内，表示意见三点如下：

1. 关于备忘录内第一条满洲问题，应于和平成立恢复邦交后，以外交方式解决之。

2. 关于备忘录内第三条驻兵问题，应于和平后，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之，不应在和平协定时，提出作为附件之一。

3. 关于备忘录内第七条汪精卫问题，另行商议。

其他第一次会谈备忘录内数点，原则上同意。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六日

对上述中国方面的意见，再提出下列意见书，作为日本方面代表的意见，交给中国方面。

### 第二次会谈的意见

对本会谈中贵方的意见，我方见解如下：

1. 关于备忘录第一条满洲国问题，虽要求在和平条件

中提及，但承认的时期和方法，考虑中国方面的希望，有协议的余地。而且关于承认，应以根据秘密协定等某种形式加以约定，此类约定以在高级会谈上协议为适宜。

2. 备忘录第三条驻兵问题，在停战的和平条件中处理，以秘密协定等某种方式确实约定。

3. 关于贵方代表所知悉的日本方面所主张的海南岛等问题，希望在高级会谈前斡旋同意，并在高级会谈时商议处理。

上列文件由日华双方各自分别接受，会谈闭幕。

## 谈判停止

在澳门的第二次秘密预备会谈完毕后，铃木于六月八日去香港，其他则乘“云阳丸”到广州，从该地乘专机回国，但由于气候恶劣，临时在太刀洗被迫降落。十日，白井回到东京，向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报告，我回到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的首脑报告了会谈的情况。

听到在澳门会谈中商定的蒋、汪、板垣三人会谈方案，板垣总参谋长非常感兴趣，披沥了自己主动进入敌阵的决心，当场就表示同意。

到重庆的宋通知香港的铃木，预定六月十六日答复，但接着又说延期到十八日。后来，宋再度把答复延期到二十日，可以想象重庆政府内部的意见调整很不容易，到了二十二日答复才到达。依据答复所说，原则上同意召开三人会谈，但会谈场所坚持要求在长沙。

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方面，以西尾总司令官和汪精卫等日华两方面的意见为基础，也考虑东京大本营来的要求，经过种

种研究之后，向重庆方面要求确实保障出席三人会谈的日本和南京方面代表安全的文件，由香港的铃木向宋提出要求。

但到了二十六日夜，铃木来电报称：宋子良的答复说，三人会谈当然由重庆方面保障安全，但拒绝制定文件。理由是，重庆政府强调，一直到会谈结束为止有彻底绝对保密的必要，同时暗中也有如果不成功怕会被日本军暴露的口吻，这显然是严重的猜疑心理在作祟。

于是，日本方面考虑：既然得不到重庆方面对代表安全的确实保障，特别是对汪的安全保障，那末，还是按照最初在澳门会谈时重庆方面的提案，分为先在上海由汪精卫和蒋介石特派代表会见，等待有结果后，再在长沙进行板垣、蒋会谈这样两个阶段会谈为适当。

对于日本方面以分两阶段会谈为主要内容的新提案，重庆方面的答复也不容易到来，徒然使时间一天天过去。在这期间内，宋和铃木虽屡有联系，但到了七月二十五日，重庆方面才来了明确的答复。

答复的内容完全违背了我们的期待。这就是，重复通知对日本方面代表的安全保障制定文件以及人质留在重庆两事，难以保守秘密；同时要求取消近卫第一次声明，而且确切约定日本方面严守秘密，不再介入蒋、汪合作，并把这些写成书面。

这可以说公然对日本方面表明了不信任感，造成同以往希望召开会议的态度逐渐疏远的气氛。

在这期间，东京又屡次发生政变，继阿部内阁以后的米内内阁也以短命告终，于七月十六日辞职。第二次近卫内阁重新登场，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离职，由东条英机中将接任。我于七月底赴东京，三十一日向东条新陆相详细报告了迄今为止的对重庆政府交涉停战和平的经过和现状。陆相极不高兴地以尖锐语

气进行追究。由于他认为日华直接和谈这种政策性的行动，是中国派遣军的越权行为，我明确了以大本营的训令为基础的任务。新陆相的想法和前陆相不同，对派遣军的日华和平交涉，显然是否定的。

进入八月后，香港的铃木同宋子良会见。宋只是重复前次所要求的文件，没有特别的进展。

但是陆军军部和总司令部依然容纳重庆方面的要求，强烈希望召开巨头会议，因此铃木为了报告交涉全貌，于八月中旬经南京到东京。结果，考虑到重庆方面如容纳日本方面的要求，用文件保障代表的安全，那末作为交换，由近卫首相和板垣总参谋长写私函给蒋介石，准备交由铃木携带。铃木于八月底回到香港。

近卫和板垣的私函内容如下：

蒋介石阁下：

敬启者，过去半岁余以来，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之代表于香港关于日华两国之问题交换意见，得悉最近阁下将同板垣中将会见。

此次会见必然确立调整两国国交之基石，深信不疑也。

近卫文磨

八月二十二日

### 关于蒋、汪合作问题的保证

关于蒋、汪合作问题，为了援助日华尤其中国内部的圆满和平，应有提供善意的意见的机会。

但（基于不干涉内政）关于停战条件一项不加处理。

兹保证如上。

板垣征四郎

宋于铃木赴东京时，八月二十四日从重庆来到香港，二十五日又立即回重庆，作为替换，二十六日章友三从重庆到达香港，二十八日同铃木会见。

章说，在八月十六日到二十六日的十天中，知道在重庆的蒋介石等人的意向，没有发生变化。

宋以后也屡次往返于重庆和香港之间，铃木对宋要求说：

“日本方面将近卫、板垣的私函，中国方面将蒋介石的私函同时交换；或者各由对方阅读，同时满足日本方面对保障安全的希望和中国方面对蒋、汪合作问题以及对日本的态度希望。”

对此，宋要求启阅近卫和板垣的亲笔信。九月八日他表示不满说：

“近卫的亲笔信不确切否定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第一次声明，而且不全面支持板垣出席的长沙会谈，是旁观态度。”

当时德国公使斯塔马在东京开始大为活动，同松冈洋右外务大臣缔结日、德、意同盟条约的形势已告成熟。同时，承认南京的汪精卫政权的促进论也到了如再加以制止就有困难的阶段。

从日本政府到军部内，虽还残留有对重庆政府和平会谈的强有力的依恋，但另一方面，当然也没有为实现和平的彻底大转变政策的决断，同以前相比，反而是南京政府拥护论更加得势，所以对响应澳门和香港的重庆方面的提案，缓和中国承认满洲国和日本军部分驻兵的要求等，成为是不可想象的形势了。

我观察这些一般形势，而且交涉本身显然为事务性问题所拘束，不能希望有飞跃的政治性决定，因此，我认为暂时中断这一谈判，日华谈判等待时机再度成熟，重新开始为有利。

到了九月二十七日，有了同成立日华和平反其道而行的成立日、德、意三国同盟的通知，于是，中国派遣军决定停止“桐”工作，暂时观望形势的变化。

这时松冈外相的意见是，日、德、意三国如果成立同盟，以其威力作背景，日华和平更加容易实现。但总司令部和这个见解完全不同。这就是判断日、德、意将要成立同盟，重庆政府内心打算可以强化英、美、法各国的援助，减低了非及早实现日华和平不可的必要程度，因此逐渐离开了和平问题，日华谈判暂时没有实现的可能。

十月一日我到东京，报告了“桐”工作的始末以后，陆相严厉命令军方立即断绝和平工作。

(吴纯海译)

---

(上接第 43 页)

学法的问题来研究。

根除“这个时期学校的根本缺点”是头等的最重要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完全不可能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不解决这个任务，学校的综合技术化本身就只具有“形式的性质”。

(摘译自 A·C·布勃诺夫：《关于国民教育的文章和演说》一书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

## 农业的变化

〔美〕D·盖尔·约翰逊

工业化国家中的农业，发展很快，变化很大。耕作方法显然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一套。畜力耕作已逐渐为机器耕作所代替，有些国家目前已完成了这一转变，而另一些国家也将在十年内基本完成。在工业化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已成为往事，不少国家的农业购置性投资额（除劳动力外），正接近于农业总产值的一半。

农业是一个有高度活力的产业部门，它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已经适应，而今后也会继续适应环境的变化。政府制定的政策，如果忽视了农业的主要特点，必然会碰壁，而且政府计划的实际费用，也会超过原先设想的水平。政府的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预见到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因势利导，而不要认为农业在适应环境的变化方面反应迟钝，进展缓慢。

### 农业和其他部门生产者平均产量的变化

计算每个工人的平均产量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可以按总产量或按销售总额平均计算，也可以按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计算。下面就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来进行计算的。

表一 每一雇劳动者国内生产总值<sup>①</sup>的年增长率(%)  
(1958—1968年)

	1963年固定价格		现行价格	
	农业	其他部门	农业 <sup>②</sup>	其他部门
加拿大	4.8	1.4	4.7	2.2 <sup>③</sup>
美国 <sup>④</sup>	5.5	2.4	6.7	4.4
挪威	2.8	3.8	5.8	7.0
芬兰	3.9	2.1	8.4	6.2
瑞典 <sup>④⑤</sup>	5.6	3.8	8.4	8.5
丹麦	6.1	3.0	8.6	8.1
英国	6.0	2.4	6.0	5.5
爱尔兰	4.0	3.0	6.4	7.3
荷兰	6.4	3.9	7.9	7.9
比利时	3.9	3.4	6.2	5.9
卢森堡	4.7	1.5	5.4	4.8
法国 <sup>④</sup>	6.5	4.2	9.4	8.9
西德 <sup>④</sup>	6.9	4.8	6.9	8.0
奥地利	5.0	4.2	6.0	7.8
意大利	7.8	4.9	9.9	9.1
葡萄牙	5.2	5.0	9.2	7.6
西班牙	5.4	5.9	11.7	12.6
希腊	3.6	4.0	8.0	6.7
土耳其 <sup>⑥</sup>	2.5	4.1	11.3	12.0
日本 <sup>⑦</sup>	—	—	12.7	12.0

资料来源：《各国统计数字，1950—1958》和《劳动力统计》（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59）

① 除了另有注明外，均按要素成本计算。

② 包括林业和渔业。

③ 1958—1965年期间。

④ 市场价格。

⑤ 1962—1967年期间。

⑥ 净产值，1955—1965年期间。

⑦ 净产值，1958—1967年期间。

表二 有关农业产量、农业劳动力的年变化率和按农业工人平均计算的产量年增长等方面的指数

	农业产量(1967—1969年年平均数对1952—1956年年平均数之比)	劳动力年变化率 1955—1968年	按农业工人平均计算的产量年增长率
加拿大	131	-2.8	4.9
美国	124	-4.1	5.8
挪威	106	-3.2	3.7
芬兰	147	-3.7	6.7
瑞典	104	-5.7	6.4
丹麦	124	-2.8	4.4
英国	145	-3.0	5.9
爱尔兰	136	-2.6	5.2
荷兰	143	-3.2	6.0
比利时	131	-4.5	6.8
法国	152	-3.6	6.8
西德	143	-3.9	6.8
奥地利	148	-3.3	6.3
意大利	142	-4.7	6.4
葡萄牙	108	-3.4	4.1
西班牙	134	-2.4	4.6
希腊	155	-1.2	4.5
土耳其	108	—	—
日本	160	-3.3	6.9

资料来源：产量来自《农业经济和统计资料月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971年1月号，第20页。

劳动力来自《产量的增长，1960—1980》（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0），第31页。

表一是二十个国家中按生产者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资料。其中十九个国家的增长率是按一九六三年的价格计算的。除了四个国家（挪威、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以外，其他所有国家中按生产者平均计算的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都高于其他部门。四个例外的国家中，只有挪威可以算得上是工业国。即使在希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和西班牙（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百分之三十一），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的差距也是微乎其微的。只有在土耳其，那里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各经济部门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才比较大。如果说，按生产者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在百分之五左右的话，这就意味着，在将近十四年中，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差异，一般也可适用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较。

表中，只有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是按现行价格来计算的。由于农产品的实际价格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按生产者平均计算的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实际上必定大大低于其他经济部门。

在表一和表二中可以概略地知道，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产量在增加，使用的劳动力在减少，同时，为了弥补农业劳动力的下降趋势，正在采取增加购置性投资的措施。

## 购 置 性 投 资

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五年间，西北欧农业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同一时期的经常生产费用（以固定价格计算）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几乎正好是产量增长率的两倍。经常生产

费用中，并不包括劳动力的支付、货币贬值以及其他投资等因素在内。事实上，这些费用表示了经常生产所需要的购置性投资额。

表三说明经常生产费用与总产值之间的关系，两者都用固定价格结算。首先，可以看到，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间，表内所列的大多数国家中，经常生产费用与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都在升高。这方面的唯一例外是英国，但是在此期间，英国的经常生产费用相当于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生产费用与生产总值的比率提高较多的国家有法国（从百分之十八点五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点二），西德（从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挪威（从百分之二十五点六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一一点四）和荷兰（从百分之三十二点八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五）。

表中最后三个国家，对购置性投资的依赖程度最少。同时，

表三 西欧国家中经常生产费用对总产量  
(以固定价格计算)的比率

国家名称	1950—1952	1956—1958	1957—1959	1963—1965
比利时	21.6	32.7	32.7	37.3
丹麦	37.3	36.9	38.9	39.1
法国	18.5	24.7	22.6	25.2
西德	27.2	33.3	34.1	37.5
荷兰	32.8	40.5	40.0	43.5
挪威	25.6	30.2	33.0	41.4
瑞典	28.0	32.0	40.6	44.5
英国	—	53.7	55.5	53.6
意大利	13.2	15.6	14.7	19.4
西班牙	7.3	10.7	9.8	14.4
希腊	8.4	9.7	10.0	13.4

资料来源：《欧洲各国农业的产量、费用和收益》（纽约，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第六次报告。）

这几个国家里农业劳动力的报酬最低，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也最差。可是不论怎样，这一时期各个国家的情况都显示出这一点，即经常性生产费用在农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强调农业中购置性投资的日益重要的理由很多。由于这一类投资经常对产量增长更具有重要性，显然，在产值中，只有较小一部分是用来支付劳动力、管理费用、土地和资本等。假若整个销售收入全都保留在农业部门里，如西班牙和希腊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的情况那样，那末，销售收入按一定的比率增长，经营者所拥有的人力、物力的相应报酬，也差不多按同样的比率增长着。而在象英国和荷兰这样一些国家的农业部门内，销售收入增长额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添置生产性物资的。

与上述情况有关的是，农产品供应的伸缩性，随着购置性投资重要性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如果一个国家农业购置性投资额很低，那末，提高产量就得主要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或是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至于人口相当稠密的地区，用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产量的可能性很有限。同样，对于大多数国家的农业来说，即使可以雇佣较多的劳动力，依靠延长劳动时间来增加产量的可能性也是很有限的。这两种办法，不管用哪一种，或是两种都用，对提高产量的作用都很小。但是，当购置性投资额达到产值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时候，产量按投资量的增加而相应增长的潜力就大得多了。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和意愿，增加更多的肥料、除莠剂、杀虫剂、高蛋白饲料和拖拉机燃料。

经常性生产费用占产值的比例越大，农业供应的弹性也就越大，但是，这意味着产品价格的提高，相对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提高人力、物力的报酬的有效手段。但是不管人们意愿如何，这种做法对提高产量是有效的。

## 畜力和机械动力

在工业化国家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取决于能否大幅度提高农用动力的数量。单靠人力或靠人力加上畜力,耕种的面积很有限。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九年这十年期间,美国已在使用马力的基础上,使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十年内,每个农业工人平均约拥有两匹半马(马、骡约有二千五百万匹,农业工人约有一千一百五十万人)。当时,美国耕地面积将近一亿四千万公顷,平均每个农业工人拥有十三公顷土地以及相应的动力和机械设备。但是,为了饲养牲畜,必须有三千一百万公顷的农田用来生产饲料;另外,还需留出相当大的土地面积作为畜牧场之用。

现在,美国的农场里几乎已看不到马匹,实际上,在一九六〇年,美国的农场就已经不见马匹了。一九六九年,美国有三百五十万农业工人,一亿二千一百万公顷的耕种面积,平均每个农业工人有耕地三十五公顷。美国耕地面积减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不必再把五分之一以上耕地所种的粮食用于饲养牲畜(当然这并不是耕地减少的唯一原因)。在从使用畜力转为使用机械动力的过程中,供人使用的农产品数量迅速增加,但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却没有那么快。尽管用来饲养马匹的饲料,作为一种能源,是被其他形式的能源(主要是供拖拉机使用的石油产品)所代替了。但是,现在不管用什么样的能源来生产电力,农业所需的能源总是有增无减的。

用机械动力代替畜力,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这时能加以利用的潜在动力数量要比最初依靠畜力时大得多。假定一匹马所提供的动力是一马力,那就是说,在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九年

间,美国农业从马身上最多能获得二千五百万匹马力的动力。到一九五〇年,马匹不再是动力的重要来源,而这时拖拉机所提供的动力是九千三百万匹马力,而到目前已增加到二亿匹马力以上。即使美国农业所生产的全部谷物都用来养马,那末,所能提供的马力总数,也只要一亿二千五百万匹左右。现在,还有一些提供动力的其他来源,如卡车和电动机,这样总的动力提供量就大大地增加了。

从畜力耕作转为机器耕作,就给工业国的农业开辟了一个发挥其本身所明显具有的潜力的重要途径。在此转变时期,农产品销售量迅速增加,达到了供过于求的水平。二次大战以来,西欧一直在逐步实现这一转变;过去二十年中,该地区已逐步采用拖拉机和其他动力来源来替代马匹,这也是农业产量增长较快的部分原因。

自一九五五年以来,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已逐步实现了用拖拉机动力替代畜力的转变(具体情况可参见表四)。由于西欧迅速采用拖拉机,到六十年代后期,该地区单位耕地面积拥有的拖拉机数量已超过北美(美国和加拿大)。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西欧每一千公顷土地上的拖拉机数是四十九台,而北美只有二十四台。在欧洲共同体最初的六个成员国中,单位耕地面积上的拖拉机数量更为惊人:每一千公顷八十二台;而在西德每一千公顷则有一百六十四台。

在欧洲共同体中,按农业工人平均计算的拖拉机增长数量也相当可观;最初的六个成员国中,每一千个农业工人平均有二百九十一台,英国是六百零二台。在加拿大每一千个农业工人有九百四十台,美国是一千二百五十台。

一个农民购置了一台拖拉机,还需配备一整套的机器装置,它们和马匹的使用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拖拉机一般也能牵引那

表四 农业中使用马匹和拖拉机的情况

(以千为单位)

	1955年	1960年	1968年
加拿大			
马 匹	832	552	360
拖拉机	480	540	620
美国			
马 匹	4309	3089	2800
拖拉机	4480	4695	4810
欧洲共同体			
马 匹	4258	3179	1496
拖拉机	1067	1989	3242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马 匹	1468	966	450
拖拉机	732	976	1304
英国			
马 匹	300	169	100
拖拉机	422	457	470

资料来源：《农业统计数字》(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9年)

些原来供马匹使用的机械，但是，采用专门为拖拉机设计的机器，就能使拖拉机充分发挥节省劳动力方面的潜力。目前，工业国家中的农业经营者都把大量的资金用来购置农机设备，而且这种投资量正在迅速增加。例如，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四年间，西德用于购置农机设备的投资几乎增加了一倍，从二百三十万美元增加到四百三十万美元；丹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从二亿三千九百万美元增加到四亿四千九百万美元。

就每个农业工人在机器设备上的平均投资量来说，英国的水平大致同美国（一九六四年大约是四千美元）和澳大利亚相仿。西德和丹麦是这一数量的一半或者一半多些；意大利仍远

远落在后面，一九六四年平均每个生产者的投资量略超过三百美元。

在工业化国家内，农业资本已经高度集中或正趋于高度集中。美国农业按生产者平均计算的投资总额高于制造业。一九六九年美国农业中按生产者平均计算的生产资料投资额为五万美元，而制造业中按生产工人平均计算的资本额却为三万五千二百美元。即使除开农田的价值不算（用于农业生产的建筑费用估计为农田价值的百分之十），一九六九年美国按农业工人平均计算的投资额也几乎达到了二万美元。

## 农业雇工的减少

表二中有一栏，列举了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八年间每年农业雇工减少的百分率。从下降的幅度来看，爱尔兰最低，为百分之二点六，瑞典最高，为百分之五点七，十五个国家的平均下降率约为百分之三点六。

这里所说的农业劳动力每年减少百分之三点六，尚未充分表明从农业地区迁往非农业地区，或者从农业转到其他行业的人员数目。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八年，美国农业雇工每年减少百分之四点一。一九五五年美国农业人口有一千九百一十万，一九六八年是一千零五十万，减少了八百六十万。一九五五年农业雇工是六百四十万，一九六八年是三百八十万，这就是说，农业人口绝对减少数是雇工减少数的三倍半。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每减少一名雇工，就会涉及到另外两、三个人。

根据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这五年的资料来看，美国从一九五〇年起每年从农业地区流入非农业地区的净移居率在百分之五点二到百分之六点三之间。这样，每年平均有十二分之

一或更多一些的农业人口，从农村迁往非农业地区。虽然目前农业人口仅为三十年前的三分之一，但是大量外流的年平均率却仍有增无减。

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八年之间，欧洲共同体的农业雇工从一千七百九十万减少到一千零六十万，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多。一九六五年，欧洲共同体最初六个成员国的农业人口是，农业劳动力的一点八倍。因此，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农业雇工减少而涉及的外流人数就不只是七百三十万，而很可能要超过一千三百万。十三年内，农业劳动力减少百分之四十，这就意味着每年外流的人数大约有一百万人。

引用这些反映某些工业国中农业人口大量外流情况的资料，是为了着重说明：农业雇工每年减少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项材料也表明，农业人口的流动性实际上是很高的。西方工业国内每年有几百万的农业人口不愿做农民，只要一有适当的机会，这几百万人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农村。人们作出这样的抉择，一方面说明这是经济发展的代价之一，另一方面也证明非农业的经济部门，正为这些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人提供着就业机会。

## 肥 料

西欧各国并不是在最近才开始使用化肥的。早在二次大战前，西欧对各种主要农作物使用的肥料，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是商品肥料。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主要工业国的化肥使用量更大大增加。在发达国家内，化肥使用量的增加对粮食增产起了主要的促进作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每公顷土地的化肥使用量为一点二六吨，而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间增加到一

点九五吨。如果不大量增加化肥的用量，那末即使采取了其他一些有助于提高产量的措施，如改进种籽、实现机械化以促使播种和收割更为及时以及使用除虫药和除莠剂等，产量的增长也提高不了多少。可以这样说，要维持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现有的粮食生产水平，化肥的施用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旦化肥的施用量显著减少，立刻就会引起产量的下降。表五扼要列举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在化肥施用方面的某些数据。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八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化肥使用总量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四。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七。氮肥的施用增长最快，达百分之一百五十一。一九六八年单位耕地面积上的化肥使用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中氮肥使用率以荷兰最高，而磷肥和钾肥的使用率以比利时最高。目前，加拿大和美国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相当少，如果化肥的价格不是象现在这样高，这两个国家的化肥施用量也会大量增加的。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八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氮肥施用量增加了八百三十万吨。如果我们假设一吨氮肥平均增加十吨左右的粮食，那末，八百三十万吨的氮肥增加量就相应地使粮食增产八千三百万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氮肥都施加在粮食作物上的，不过这里还是要着重提一下，在整个上述时期内粮食大约增产了九千五百万吨。显然，要增产粮食，除施加氮肥之外，还需要采取其他措施，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不增加肥料，就不可能提高粮食产量。

## 农业的过去和现在

现在，许多人都注意到西欧、北美农业的高度复杂性和巨大

表五 商品肥料的用量(除注明外均以千公吨计算)

国 家	氮 肥				磷 肥				钾 肥			
	年使用量			公斤/ 公顷 积 1968	年使用量			公斤/ 公顷 积 1968	年使用量			公斤/ 公顷 积 1968
	1955 / 1959 平均	1960 / 1964 平均	1968  ①		1955 / 1959 平均	1960 / 1964 平均	1968		1955 / 1959 平均	1960 / 1964 平均	1968	
奥地利	30	60	(115)	72	69	102	(120)	75	71	115	(143)	89
比利时	90	118	170	199	102	108	185	216	151	173	175	204
加拿大	53	126	(390)	10	121	219	(380)	10	87	110	(230)	6
丹 麦	102	144	249	92	107	117	124	46	159	174	181	67
芬 兰	61②	71	126	46	101②	107	152	55	71②	84	118	43
法 国	451	702	1210	68	825	1128	1587	89	647	886	1173	66
西 德	555	709	933	119	603	719	781	99	955	1090	1046	133
希 腊	60	100	182	23	45	79	117	39	7	13	17	6
冰 岛	6	9	12	—	3	4	7	—	2	2	5	—
爱尔兰	18	30	64	55	66	102	156	134	49	81	134	115
意大利	289	365	514	44	396	384	470	41	74	126	177	15
日 本	613	720	907	171	355	482	697	132	423	561	696	131
卢森堡	4	5	9	136	5	6	7	106	5	6	8	121
荷 兰	201	269	339	394	111	109	104	121	153	135	125	145
挪 威	44	55	71	84	43	46	54	64	49	52	60	71
葡萄牙	56	76	101	32	75	63	61	19	9	12	19	6
西班牙	205	329	568	36	282	304	389	25	85	95	162	10
瑞 典	90	122	191	63	103	108	139	46	87	90	126	42
瑞 士	13	20	32	86	42	47	43	115	30	47	60	161
土耳其	15	38	187	8	7	33	182	8	4	1	12	1
英 国	337	535	951	129	403	466	451	61	368	424	444	60
美 国	2134	3505	6199	34	2190	2847	4169	23	1831	2269	3507	19
南斯拉夫	54	134	270	36	60	107	159	21	54	115	182	24
欧洲经济 共同体合计	5490	8242	13790	41	6114	7687	10354	30	5371	6661	8800	26

资料来源:《农业评论》(巴黎,欧洲经济共同体,1970)

① 括号内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秘书处估计数

② 1959年

的生产能力,但是他们很难理解,直到十九世纪前期,这些地区的农业还是十分落后的,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变化,这些地区的农业情况,就会同人们在目前世界上那些发展中地区(例如南亚)所看到的情况,没有多大的区别。在那时,除了英国以外,整个西欧和北美地区,以农为生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这差不多正是目前发展中地区的情况。因此,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现代化农业还很年轻,只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史。甚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工业国的粮食生产也和发展中地区处于同样的水平。就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这些国家农业所使用的动力来源,也正是目前发展中国家使用的那些动力来源。

今天已实现工业化的那些地区,在十九世纪快结束时,按农业生产者计算的平均耕地面积和目前印度平均耕地面积之间的差距,也并不象许多人所想象的那么大。可以拿当时的法国和现在的印度比较一下。一八八〇年法国平均每个男劳动力所拥有的耕地面积为七公顷左右,一九六五年在印度为两公顷左右。法国一八八〇年单位面积的农作物总产量和印度一九六五年的水平相等;法国在一八八〇年按农业生产者平均计算的农业产量,仅仅是现在印度的三倍半,但是到一九六五年,法国按生产者平均计算的农业产量就为印度的二十倍。丹麦是当今世界上农业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它在一八八〇年按男劳动力平均计算的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都是一九六五年印度的五倍;到一九六五年时,丹麦按农业生产者计算的耕地面积也还只是印度的五倍,可是平均农业产量已提高到印度的二十五倍。日本在一八八〇年的平均农业产量大约同印度在一九六五年的产量相等。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日本按农业生产者计算的农业产量已是印度的六倍,单位面积的产量已是印度的七倍。

在美国的全部历史中(从欧洲人开始在那儿定居起),它的

土地对劳动力的比率始终是较高的。和工业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按每个生产者平均计算的产量一直较高,而单位面积产量相对来说则较低。例如,一八八〇年美国按生产者平均计算的耕地面积为一九六五年印度的十五倍,而按生产者平均计算的产量仅超过印度的六倍左右。到一九六五年,美国按生产者平均计算的耕地面积在一百四十公顷左右,大约是印度的七十倍,而平均产量则是印度的五十五倍多一点。

作如上比较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显示工业国农业比发展中国家农业优越。恰恰相反,我只是想说明:如果追溯到近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就会看到工业化国家那时的农业和今日印度次大陆的农业情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一百年来,工业化国家农业面貌的迅速改观,主要并不是由于农民们掌握了农业生产

表六 一九六〇年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农业产量、农业投资额(按每个男劳动力平均计算)以及用于农业教育、研究和发展的经费

	美国	日本	印度	美国 日本	美国 印度
农业产量 (小麦单位产量/每个生产者)	96.2	10.7	2.22	9.0	43.3
化肥 (公吨/每个生产者)	2.13	0.32	0.0038	6.7	560.5
机械设备 (马力/每个生产者)	45.9	1.07	0.0077	42.9	5961.0
耕地面积 (公顷/每个生产者)	129.7	1.43	1.99	90.7	65.1
教育 (入学率%)	100	90	26	1.1	3.8
研究与发展 (大学毕业生/一万名生产者)	22.8	14.2	0.40	1.6	57.0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经济杂志》(1969年8月号,纽约美国农业经济协会编)

的各种条件，而是各个经济部门普遍迅速发展的结果。遗憾的是，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由于在六十年代采用了新的种籽和化肥，兴修了水利工程，从而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但至今还是依靠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劳动力的措施来提高产量。

表六提供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了在过去的一百年内，农业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该表以一九六〇年为例，对美国、日本和印度三个国家的农业的几个重要的特点作了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到，在按农业生产者平均计算的主要农业投资额方面，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惊人的。平均产量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可以从劳动者的各种劳动条件和农民受教育情况的差别中得到解释。因此，我们不能说，印度的农业经营者和农民，比美国或日本的农业经营者和农业工人的能力差或工作效率低。印度农业经营者和农民是在各方面条件都要差得多的环境中进行生产的。

（摘译自《混乱中的世界农业》，英国贸易政策中心，一九七三年版 上海第一钢铁厂工人业余翻译组译）

# 重建美国农业

〔美〕盖伊·霍尔沃森

## 变化中的美国农业

美国食品工业结构复杂，实力雄厚，年产值达一千二百亿美元，是全国最大的顾主。该工业目前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问题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美国农业如何在产量已经很高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对生产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工艺革命，同时既不牺牲家庭农场，又保存住美国农村的传统道德伦理准则——这些准则在形成美利坚共和国的性格方面，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

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由于全国报界的漠不关心，以及国会越来越偏重于城市，美国农业长久以来一直得不到公众的注意。现在美国农业迫切需要有一项统筹兼顾、步调一致的全国性政策——确实需要有一项发展农村的“马歇尔计划”。专家们还认为，应该作出一些重大的决定，不仅要解决农村发展、教育计划、运输和农村卫生医疗方面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谷物管理、价格结构和农业津贴等问题，否则在今后十年里，又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农民被迫离开乡土。

最重要的是，美国是否甚至想要使全国都成为一座一尘不染的、标准化了的、关心技术的农业大工厂，大规模生产品种单纯，规格一律，但往往是极其乏味的产品（象在专门饲养装置中的阉猪。或者说，象以往几十年的美国烧烤业那样）。

单拿农药控制的问题来说，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农民每年都要在农田上使用一千二百万磅以上的 DDT，而往往没有认真考虑过长远的后果（许多农民对美国政府最近颁布的不准使用 DDT 的禁令，还深表不满）。在五十年代的某些年头，他们使用的 DDT 剂量，甚至比上述剂量还要高五倍。实际上，一些批评者担心，总有一天，美国大片大片的农田会遭到彻底破坏，成为再也无法耕种的不毛之地了。

再说，发展趋势也很明显：农业正全面地朝大型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过去四十年内，美国农场数目几乎一直在直线下降。一九三五年新政时期农场有六百九十万个，而到一九七二年估计只剩下二百八十万个。与此同时，农场规模却在急剧扩大，一九三五年农场的规模平均不到一百公顷，而现在扩大到四百公顷左右。目前农场的价值平均在十万美元左右，每年往往可净得一万五千美元的巨额收益。

此外，目前全国农业人口为九百二十万，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还不到一九二〇年的农业人口的一半。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不仅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还几乎成了世界的粮仓。

今年农业净收入预期可高达一百七十九亿美元，这是一九四七年以来最高的纪录；农场平均收入去年为五千四百六十八美元，今年将增加到六千三百美元。部分是由于经济繁荣的缘故，农场主投入大笔资金购置农机设备——簇新耀眼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棉花打包机和重型载重卡车。今年购置农业设备的总额，超过了一九六〇年四百三十三亿美元的高峰纪录。

然而，尽管表面的繁荣迹象令人陶醉，但是农场主也还是有其苦衷，牢骚满腹。购置同类设备的费用在继续上升，更不用说劳动力的开支了，而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却跟不上消费

者收入的增长。

尽管有九分之一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花费在食品上，但是这方面收入中相当的一部分，对某些产品来说也许高达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六十五，落进了“中间人”的腰包——所谓“中间人”，就是指那些四下钻营活动、兜售农产品的经纪人。

农业部长厄尔·L·巴茨及时注意到，在过去二十年中，消费者收入提高了百分之三百左右，消费品的价格指数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而农产品价格(农民的实际所得)却仅仅提高了百分之六。

从严格的商业角度来看，美国农业投资的利润并不很大。有一篇调查报告说，一九七二年农业的投资利润率仅为百分之五点四，而制造业的投资利润率却几乎高达百分之十六。

## 行动的时刻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一致认为，现在该是对美国农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1. 特别是要制订一项毫不含糊的全国性农业政策，明确美国农业目前的处境和今后发展的方向。并决定是否应该继续放手让农场向“大型化”发展，使农业产量随之不断增高，从而把成千上万收支相抵而无赢余的农业经营者全都压垮？

2. 虽然，非农业公司暂时减少了对郊区的兴趣……，但是农业“公司化经营”方面的危险仍然存在，因此，必须认真加以对付。同时，这个国家的农民，非常需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在农业工会问题上，有一个协调一致的政策。

3. 对全国主要农业组织来说，争取农村选票的尖锐斗争将会继续下去，而且越演越烈。不仅那些着重控制成员的“农业联

盟”组织，如全国农民协会、全国农民组织和全国保护农业社等情况如此，就是着重市场销售的、规模庞大的美国农业联合会也是这样。此外，鉴于这些农业组织面临着同新的产品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某些观察家认为，在今后几十年里，大概只有一、两个全国性农业组织能保存下来。

4. 今年是选举年，只要农民们设法联合起来，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就能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谋求一些实惠的政治交换条件。这种机会也许是几十年来都从未有过的。

### 发展美国农业的“马歇尔计划”

高级政界人士坚持认为，单靠州一级采取行动，根本无法阻止熙熙攘攘的人群从农村涌向城市；从长远来看，只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合采取全面的、大规模的积极措施，再加上地方城镇居民自己的坚强决心，才能挽救美国农村。专家们一致认为，至少得采取下列措施：

**协调一致的计划** 精心制定一项规模宏大的农村“马歇尔计划”——投资修建饮水、电话、污水处理等系统，为建造谷物管理仓库和其他小型设施承担费用，并对农民提供更多的信用贷款。

**上下协调** 急需发展联邦、州和村镇间的新型管辖关系。目前，联邦政府的大部分发展计划主要是为美国城市地区而制定的。在为农业地区的村镇服务方面，伊利诺斯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该州精心拟订了一份关于援助小型村镇的重要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明确规定了村镇的地位，以及它与州、联邦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在理查德·奥格尔维州长的坚持下，该州还投入大笔资金，用以修建公路干线和兴办教育事业。

**税收鼓励和农产品推销** 州政府和市政府必须在税收方面，对迁入农村地区的工厂以及联合市场等给予鼓励。许多经济学家，如明尼苏达大学的威拉德·科克伦等指出，如果单靠支持农业经营，并不能解决农村地区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还必须在农业上进行工艺革命，在农村地区兴办非农业性的生产事业。

**运输** 在调整价格以利于农民销售产品的同时，重建通向村镇的高速公路运输线。有些来自农村的议员说：目前修筑的全国铁路网，大多数是从许多农村地区附近绕道而过，这种情况只会促使农村人口迅速流向城市。

**更严格地规定土地的使用权限** 据伊利诺斯大学研究员詹姆斯·史密斯说，全国主要农业耕地中至少一半有被城市侵吞的危险。因此，极有必要保障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幸运的是，事态似乎正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在发展，因为十几个州都已经削弱了市政府和县经办人员划分土地的权力，颁布了更严格的控制法令。

作者在写本文时，美国政府和国会正致力于研制一项重要的援助农村计划。这个大事渲染的“一九七二年农村发展方案”，将把数十亿美元的地区拨款和岁入用于建造村镇的各种设施，如污水排除系统、消防站和公共卫生设施等。美国农业部负责农村计划方面的高级官员约瑟夫·科菲说：“这项计划是个重大的步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同国会建立经济就业局的措施相提并论。”

可是，就连科菲和其他政府发言人也都承认，这项立法，如果不能坚持贯彻始终，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广泛协作，包括地方的参加以及地方积极性的发挥，那也不会是行之有效的。确实，一些分析家认为，就“发展农村”这个概念来说，对人们不过是一种

浮光掠影的措施,没有深入触及到更本质的问题,那就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使他们安心务农这样一个首要问题。

不管“重新发展农业方案”的效果如何,在美国农村中,目前改善住房条件,解决灌溉、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已成了今日美国农村的当务之急。从全国来讲,将近百分之六十的非标准住房,百分之五十的贫民,都是在农村。然而,近十年来,由于一切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城市问题上,联邦政府用于农村地区的住房的补助金,还不到全国总经费的四分之一。

(摘译自一九七二年十月美国《时事》杂志 上海第一钢铁厂工人业余翻译组译)

## 战后日本农业被摧残的过程

〔日〕《人民之星》报

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给予日本农业和日本农民造成了什么样的命运？而且，现在农民是处于什么样的景况？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分析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农民的现状，以便分清敌我，正确指明农民运动前进的方向。

从战后到目前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自战败至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战后复兴时期；自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的“高度成长期”；进入七十年代后的危机阶段。

### 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和半封建的 土地所有制的瓦解

“明治维新后成立的专制主义天皇制，依靠寄生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并联合这些阶级的上层，掌握着无限的权力，对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而且不断对亚洲各民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日本共产党（左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日本农业和农民在专制主义天皇制的暴虐统治下，横遭残酷掠夺和摧残。在专制主义天皇制的统治体制中，垄断资本的地位逐渐上升，地主的地位却相对地缓慢下降；这一过程也与农民要求减免佃租、保护佃权、要求土地改革等而不断掀起的激烈

斗争互相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战时体制下，日本垄断集团已着手开始废除地主制。但是，从整个日本的权力结构情况来说，垄断集团无法根本解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美国帝国主义按照它侵略、统治世界的计划，加强对日统治，将日本的统治阶级及其机构基本上作了如下的改组：

“打乱专制主义天皇制，把包括天皇在内的官僚特权机构，改变为美国帝国主义统治日本人民的工具。通过让佃农买进山林荒野以外的佃耕地，基本上废除了寄生地主阶级的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将农民直接置于美国垄断资本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剥削、掠夺之下。”（同上《政治报告》）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日本资本主义被迫从属于美国帝国主义，金融寡头的统治按照这一情况进行改组，战前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已被清除。

以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为中心的反动派，代替了以专制主义天皇制政权为首的寄生地主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成了日本人民、农民的新敌人。

美日反动派最怕日本人民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失败这个条件，起来取代它们的地位。战后初期，日本工人阶级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起来斗争。农民也奋起要求取消军事基地，反对地主收回土地，这个斗争以浩大的声势蔓延于全国。

害怕人民的反抗并已丧失了统治能力的日本反动派，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实行了“农地改革”。通过这个“农地改革”，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被摧毁了。百分之五十的佃租被大幅度削减；实物佃租被废除；新产生的大量小自耕农代替了先前的佃农。

两百万町步<sup>①</sup>的土地卖给了佃农。战争刚结束时，日本只有一百八十万户自耕农，到一九五〇年，自耕农激增为三百八十万户。完全佃耕的农户数，自一百六十四万户激减至三十一万户。战前占总耕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四的出租土地，已缩减至百分之九点三。除山村外，寄生性的大地主都已消灭，约一百一十二万户的在外地主也逐步绝迹。美日反动派把新产生的自耕农作为他们剥削、掠夺的基础。因此，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大为改变，与此同时，半封建的残余也逐渐得到了清除。

战后日本农业和农民，依附于美国资本主义，被置于美日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掠夺之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寄生的地主制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现在障碍没有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一定的限度内得到满足，又加上农民的努力，从而取得了“新的发展”条件。由于佃农变为独立生产者——个体农民，生产热情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始逐步发展。

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这是更加狡猾、更加痛苦的压迫，也是新的阶级分化的开始。

对于美日垄断资本来说，为了谋求濒于危机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恢复，工矿业再生产能否正常进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通过对日本人民的赤裸裸的镇压、剥削和掠夺，进行资本积累，使人民遭受到工资冻结、解雇、通货膨胀、重税等等的祸害。

对美日垄断资本来说，加强对农民的剥削是特别重要的。他们从国内市场上，尤其是从农业、农民的身上，榨取那过去可以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得到的收益，并把它作为发展工业的资本来源。

<sup>①</sup> 日本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每町步约等于14.88市亩。——译者

历届反动政府一贯采取农产品低价政策，说具体点，就是依靠国家权力强迫农民将粮食以低价卖给政府，并向农民征收重税。黑市就是起因于此的一种现象。

复员军人造成农村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农民所有的土地相对更少了。政府还对昂贵的进口食品提供差价补助金，以此来维持农产品的低价和工人的低工资的基础。

战后资本主义的复兴，是以农业作为牺牲品，并吮吸工人、农民和人民群众的鲜血而进行的，只有卖国的垄断资本家脑满肠肥。

美帝侵朝战争所带来的“特需”，对于萧条的日本资本主义、卖国垄断资本的复兴，是一个重要的刺激，使这个时期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日本的阶级斗争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以工人为首的人民斗争向革命的方向猛进。为了把人民斗争的高潮引向革命的方向，需要有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明斗争方向的正确路线。

当时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受了野坂参三等人的修正主义的影响，犯了把日本人民的新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当做朋友的重大错误，而且错误地不把农民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农民的新敌人——美日反动派，却只是把战前的寄生地主制的残余当做敌人。所谓一九五一年的纲领，否认寄生地主制的瓦解，一直犯了同农民的实际矛盾不一致的错误。

## 六十年代“高度成长”政策 和“结构农政”的开展

自五十年代后半期起，日本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的高

度积累、即所谓“高度经济成长”时期。

日本垄断资本依附于美国之下，着力地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美日垄断资本的“高度成长”是以牺牲日本农业、抛弃大量的农民来实现的。

美国帝国主义让日本资本主义得到恢复，是为了把它“养肥了再吃”。在日本经济进入了“高度成长”期后，美国愈益重视把日本作为它直接掠夺的市场。强迫日本垄断资本和政府接受美国商品和农产品进口的“自由化”，摧残日本的煤炭工业而让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统治日本，就是这种行动的开端。由于对“高度成长”特别重要的原料、资源和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等，日本垄断资本都要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因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就出卖日本农业，为美国剩余农产品大开进口的方便之门。对于拥有过剩农产品的美国来说，日本正是合适的推销剩余农产品的市场。

根据一九五四年的《日美相互安全保障法协定》，日本从美国大量进口小麦，从而使日本农业的重要的复种作物——小麦，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一九六〇年的“自由化”以后，美国农产品进口对日本农业的破坏，更进入了一个严重的阶段。为了促进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和“自由化”，美日反动派大肆宣传“开放体制”、“国际分工论”等谬论。

一九六一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是扶持美日垄断资本“高度成长”的农业基本政策。它具有这样的目的，使日本垄断资本从属于美国并获得自身的利益，破坏日本农业，掠夺日本农民，促进农民的分化，使大量农民破产，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赶出农村，作为新的剥削对象，以便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它还使一部分中农和富农怀有对农业近代化、机械化的幻想。这是企图通过这种幻想，暂时缓和美日反动派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加以调

整,重新改组日本农业使其为美日垄断资本服务。

美日垄断资本根据农业基本法,在“农业近代化”、“改善农业结构”的美名下,积极地开展了所谓“结构农政”。他们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便让农民生活过得富裕的借口下,实行了大量抛弃农民的政策。在全国各地,“改善结构”事业得到进展,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垄断资本对农业和农民的控制。由于农用物资价格上涨所造成的生产费用的增加,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垄断资本控制市场所带来的农产品的价格变动和低价收购,以致果树、牲畜饲养等业完全无利可图,结果是农民负债累累,农业被摧残得更加厉害了。

美日垄断资本为了“高度成长”,采取了强迫工人阶级接受低工资,强迫农民接受农产品的低价的手段,从而使农民无法只靠农业过活,被迫离开农村。这个时期,日本垄断资本由于获得低廉的劳动力的支持,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得到了提高。

在整个“高度成长”期间,日本农业和农民的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它表现如下:

日本的农产品进口额急速增加,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十年间约增长四倍。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占日本进口农产品总数的四成左右,对于美国来说,日本成了它的最大的农产品市场。其结果,日本的粮食产品的综合自给率自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九十下降到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七十六,小麦从百分之三十九下降到百分之九,大豆从百分之二十八下降到百分之四,精饲料从百分之六十七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十年间,农产品自给率都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这种状况表明,美国帝国主义在给予日本农业以毁灭性打击的同时,甚至一直控制了日本人的肚子,这就说明了日本依附美国之深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卖国性质。

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的十年间，农业被摧残，使耕地面积自六百万公顷减至五百零八万公顷，农民依靠农业收入的程度，也从百分之五十五下降至百分之四十二，从而提高了依靠非农业收入的程度。农户数自六百零四万户减为五百三十五万户；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口从一千四百五十四万人减少到一千二百零五万人。一九五五年专业农户占百分之三十五，兼业农户为百分之六十五，而到了一九七〇年，前者仅占百分之十五，后者则达百分之八十五。

这些事实说明，在整个“高度成长”时期，一方面是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垄断资本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大力地强制执行使农民分化的措施。农业经营的困难造成大量农民倾家荡产，弃农兼营别业或沦为半无产者。而那些中农、富农中获得发展的为数也极有限，他们也由于垄断资本的掠夺而负债累累，农业合作社、银行、公库<sup>①</sup>吮吸着他们的脂膏，使他们陷于如不更加扩大经营规模就无法维持的矛盾之中。

由于美日反动派对农业的摧残，日本农业改组的不断推进，农民大规模地被吸收到垄断资本的再生产结构中去。农业内部的各种矛盾激化，农业劳动主要由老人和妇女负担，男人长期去外地做工，一家离散、土地荒芜，这些已经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农民的意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和发展。“从生产自给转变为商品经济的农业”，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摧毁了农村中半封建的残余、习惯、传统和意识等，而代之以依附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意识。这种状况，使贫农、农村无产者更容易受到先进城市工人的影响，而逐渐地创造出更加革命化的条件。

日本农民斗争的新的发展方向，已经进入了提出“突破农业危机”的口号的阶段。

<sup>①</sup> 日本政府经营的一种金融机关。——译者

## 七十年代的危机阶段和“综合农政”， 农民运动的新高涨

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末的“高度成长”时期，是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时期，也是相对的安定时期。在这一时期，美日垄断资本从工人、农民和人民群众身上榨取了亿万财富，进行了高度的资本积累。可是，在这整个过程中，美日垄断资本所控制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迅速积累起来，并不断地在激化着。

依附于美帝的畸形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条件，同世界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深化、美国帝国主义地位的下降、美国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等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日本出现了更加尖锐的深刻危机。以牺牲农业而大大发展起来的工业生产力，同美日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激烈地发生冲突，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从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高度经济成长”的破产，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产过剩、物资不足、垄断企业投机倒把、人民生活的恶化和社会动乱的增多等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从经济基础上动摇美日垄断资本的统治了。它不可避免地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高涨，带来工人、农民和人民群众的各种斗争的急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反动派制定了更彻底地摧残农业、掠夺农民的方针。

一九六八年宣布的“综合农政”，以它为根据的“第二次结构改善事业”的实施和更为恶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以及各种各样与农业有关的法案，莫不露骨地表明他们的目的。其特点在于抛弃百分之九十的现有农民，只扶植三十到四十万“核心的农

业经营者”。

在“综合农政”之下，日本农业的中心——水稻作物，也终于遭到了减少耕种面积的厄运，曾经是“有选择的扩大”的牲畜饲养和果树两个生产部门，也在美帝国主义农产品“自由”进口的面前大为衰败，连中农和富农都受到了打击。

农业被摧残的情况是惊人的。为了征购农民土地而制订各种法规和措施、垄断资本大量收购土地、确保工业用水和破坏农业用水、公害的扩散、重税以及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上述这些惊人的情况，在七十年代以后仅仅几年的时间里，愈益加剧了农民的破产。

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增长率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得多，占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的一成左右。

农户数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期间，减少了二十万户。〔据一九七五年《朝日年鉴》的资料，到一九七四年，又减少了七万三千户。——译者〕专业农户数减少了十五万户，以致专业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二、兼业农户占百分之八十六点八。

第一种兼业农户（以农业为主而耕地面积较多的阶层）中，从事雇佣劳动的兼业者占百分之九十二。他们当中，小工、日工、去外地干活的人占百分之五十。

第二种兼业农户（以农业为副而耕地面积较少的阶层）中，从事雇佣劳动的兼业者占全体户数的近百分之八十，其余百分之二十则为林业、渔业、工商业等的个体经营者。雇佣劳动兼业的人们中，约百分之五十四为经常的工资劳动者，百分之十七为小工、日工和去外地干活的人。此外，即使拥有三公顷以上的上层农民（七万两千户），专业者也不过约为百分之三点一，其余都是兼业的。

大部分的牲畜饲养仍然依靠农民，小部分则属于垄断资本系统的富农经营。在这一部门，如不同样实行大规模经营，也会越来越无利可图；农民正遭到没落的命运。经营果树、烟叶、养蚕、高级蔬菜、花卉等等的农民，全都陷于同样的命运。

农民有生产资料，是独立生产者，因此经常希望变为上层农民，随着他们进入上层而强烈地具有向往资本主义的幻想，在政治上、思想上强烈地具有反动倾向。然而，由于农业在七十年代遭到惊人的摧残，这种幻想被打破了，广大农民正以农业合作社为中心，大规模地起来进行斗争。

如我们从兼业的内容所看到的，无法以农业为生而依赖非农业收入的下层农民，干着不定期的雇佣劳动，成为企业外包工、临时工等等，他们的劳动条件大部分是最坏的。七十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为扩大了。

在当前日本资本主义一片危机声中，纵使农民想依靠兼业为生，但求雇于人的困难却愈来愈增加。

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是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卖国垄断资产阶级摧残日本农业、掠夺日本农民的历史。

是通过人民民主革命、按照解放农民的方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通过强制实行摧残农业的政策，按照扶植少数“核心的农业经营者”的方针来解决呢？这是日本农民同美日垄断资本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危机日益加深的美日反动派，必将是继续更大规模地摧残农业和掠夺农民，他们同农民的矛盾和对抗也必将更为激烈。

美日反动派自己正在挖掘坟墓，日本工人阶级必须重视同农民的团结，用革命的办法来支持农民斗争的新高涨。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九月六日日本《人民之星》报的  
《农民解放的基本路线》一文 丁日初译）

## 全世界会有足够的粮食

〔美〕约翰森

有些人预言，本世纪末将要出现大饥馑。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个世界能够让数十亿人都有饭吃。

美国农业部的一位高级经济专家威廉·葛萨说：“这个世界具有管自己吃的物质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还指出：“这个星球上实际耕种的土地，还不到全部可耕地的一半。而且，只要人民和政府愿意付出代价，必要的技术、肥料以及其他原料，都是可以办到的。”

在全世界一百三十多个国家中，生产的粮食能自给有余的，只有七个：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爱尔兰。这七个国家只有三亿两千万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十二分之一还不到），而且其中大部分又都在美洲。

反之，人类的三分之一，却生活在从印度到南美之间五十多个挨饿的国家里。在这十三亿人口中，大约有九亿人挤在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印尼四国。至于其余的四亿，则生活在其他六个亚洲国家、三十五个非洲穷国和八个拉美国家里。

居于这些赤贫国家同那些粮食富裕国家之间的，便是其他七十五个国家。它们能替自己的老百姓生产或购买必要的粮食。

审视全球，在提高粮食生产的战斗中取得惊人成就的不乏其例。一度因饥馑而人们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爱尔兰，如今每

逢好年成，就能出口价值近十亿美元的农产品了。许多农业学家们都说，既然泰国能有大量稻米剩余，那就表明东南亚的那些稻米之乡，如果不是战火连年，该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啊！

## 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

也许一个最扣人心弦的成功例子，要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那里由于进行了人力动员并对现有的粮食供应加以比较平均的分配，多少世纪来缺粮甚至挨饿的现象，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之所以有翻身之日，主要得归功于共产党有条不紊的组织和长期内战的告终。

## 嗜食牛肉

也得把俄国列作能为它的人民提供足够粮食的国家。粮食短缺是通过向国外——主要是向美国大量进口的办法来弥补的。估计莫斯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会继续向世界市场购买粮食。由于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所得的利润以及大量库存黄金价格日益增长，它的支付能力突然提高了。

俄国、美国、西欧和日本，被指责为挥霍宝中之宝的粮食，借以满足本国人民越来越爱吃肉类的食性。这些国家用作牛饲料的每一蒲式耳粮食，如果能让各闹饥荒国家的人民直接食用，就可以使人类粮食的使用价值提高许多倍。

密执安州立大学的一位高级农学家葛奥格·鲍格斯特罗姆说：“世界上粮食和饲料交易中主要的受益者是欧洲和日本。欧洲每年向世界市场购粮而净得的植物蛋白质，要比整个印度次

大陆所取得的还多，而日本所净到手的，也要达印度次大陆的三分之一。”他说，在某些情况下，饱国竟把俄国的粮食抢购一空。例如，根据他们的估计，单是欧洲从闹饥荒的非洲和印度进口的成吨成吨的花生蛋白质，就足以解除那些地区中的一亿五千万人民所受的营养不良之苦。

富国的日本也是人口过密，它消耗的食物比本国少得可怜的农田以及附近渔场能提供的食物高五倍以上。根据鲍格斯特罗姆先生的计算，富裕的日本人所买的大豆，足以填补印度六亿人口中半数以上人民的“蛋白质空白”。

许多经济学家说，减少富人的消费，是无济于事的。除非穷人买得起富人节省下来的粮食，或者是，除非有谁愿意替他们买粮，不然的话，节约只会导致粮食过剩，从而迫使粮价大落，以致在供应充沛的那些国家里，农家只得减少产量。

## 收成和危机

许多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目前的粮食危机是由于一九七二年气候恶劣，限制了苏联、非洲、亚洲和澳洲的产量所引起的。一九七三年的产量虽已复原，却不足以抵销一九七四年美国中西部歉收的灾难。

过去二十年中，世界粮食产量之所以能不仅增长了百分之五十，而且仍能超过人口增长率达百分之二十二，主要是由于农业现代化的结果。但是在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四年间的干旱、严寒和水灾，把世界粮食储备都搞光了。二十年来的进步和乐观变成了一场惊恐。美国农业部的经济专家们指出，从马尔萨斯于一七八九年发出人口过剩和大饥馑的骇人听闻的预言以来，现代世界至少已经经历了五次全球性的缺粮。他们坚信，全世

界也经受得住这次缺粮危机而继续生存下去——只要各国政府把粮食生产放在首位，并把粮食用在刀口上。

受大饥荒威胁的印度，史无前例地以商业价格向其他国家购买了五百万吨谷物。为此，它又从已经够穷的国库中挤出了十亿美元。

### 援助有害吗？

某些评论家认为，过去美国的援助（最近二十年中达两亿四千万吨以上）掩盖了缺粮的症状，哄得穷国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作彻底的解决。他们主张，从长远来看，更经济或更有效的办法是，帮助不发达国家自己生产更多的粮食。一方面，可以节约运费；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使用农业原料。根据有些人估计，同样一磅肥料，用在印度，提高产量的效率，要比施在美国早已吃饱了肥料的地上高出一倍。国务卿基辛格去年十一月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会议上说：

“粮食赤字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正是增产潜力最大的国家。这些国家中未经利用的土地和水利最多。它们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比发达国家要多出百分之三十五，然而产量却要少百分之二十。”

### 有钱的地方

当局承认，黑市、贪污和运输工具缺乏，也是使饿得最厉害的人们得不到粮食的原因。在孟加拉国，去年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而据某些官员估计，几十万吨急救粮食却被走私者运往印度牟利去了。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说：“哪里有人出得起钱，粮食就必然运往那里。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发展这些国家的农业经济，根治饥饿的基本原因——贫困。”

悲观主义者说，这个根本原因年久月深，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看来，它要比任何技术落后都更难克服。

粮食权威雷士德·布朗在《单靠面包》一文中写道：“对现有的土地和水利资源投入大量能源和肥料，从而把粮食产量提高一倍至两倍，这还是比较容易设想的。”但是他又补充说：“问题的关键是，新开发的资源，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加以利用？”

有些科学家已经在担心抽水机所需燃料的价格飞涨，而从天然气提制的肥料又不足；这就势必使六十年代一度给饥饿国家带来希望的绿色革命濒于流产。

在粮食危机中，对那些哄抬粮价而卖不掉粮食的人的冲击是十分严重的。世界动态调查所负责人布朗在观察世界粮食形势时说：

“近来的粮价上涨，早已大大超过了世界上几千万赤贫者的收入增长。几百万收入微薄的人，其用粮水平之低，使他们很难糊口。”

全球人口在今后三十五年内预计将增加一倍，各国都已经在为日渐减少的资源（从北海的石油到秘鲁沿海的鳀鱼）而你争我夺。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人担心世界将再度受原始森林中弱肉强食的法则所统治。

## 贫困和生育

大多数科学家相信，最终的答案必然是，减少人口增长，以

控制对粮食的需求，特别是在穷国。

但近来的研究证明，降低出生率的最好办法是，消除营养不良和贫困的影响，因为贫苦无靠的人，往往把孩子当作生存斗争的资产。人口统计学家们说，在最穷的国家推行节育，必须同时提供粮食、教育和职业。

许多官员认为，对世界穷人以及整个人类的远景，丧失信心，这是把目前这场粮食危机突出于其他粮食恐慌之上的一个主要原因。农业部经济学家肯尼迪说：

“不论是自满情绪，还是引起失望的惊慌情绪，都是十分危险的。世界是能够应付这个难题的；至于它愿不愿意，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顾畴、陈中绳合译）

## 瑞典实行抑制通货膨胀的农业政策

〔美〕马歇尔·科恩

由于实行了农业三年计划，瑞典正在执行新的农业政策，以增加农作物产量，并把食品零售价格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根据这项新计划，以前由食品消费者负担的一部分农产品费用转归政府负担，而这笔费用是依靠瑞典历史上最大的“消费品”补贴的资助来解决的。

新农业政策虽然不至于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进口，但是由于政府承担了控制通货膨胀的责任，因此，将来可能会导致增加食品和饲料的进口。瑞典是美国农产品的日益扩大的小市场，它在一九七四财政年度内，进口了价值八千六百万美元的农产品，主要是水果、蔬菜、未加工的烟草、谷物、油脂和植物油等。

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实行的瑞典新农业计划，可能会影响到今后几年内的生产和价格。最突出的几点如下：

政府增加了直接付给农场主的补贴，主要是为了抑制食品费用上涨所引起的通货膨胀。

同过去的农业政策相反，鼓励农作物生产达到更高的水平。只要费用不大，甚至可能把生产扩大到这样的程度，小麦要有积存而可供出口，油料作物、奶油和猪肉也要有少量积存。

要认识农业在保护和保持乡村的美好特性上所起的作用，并利用政府的拨款和贷款支持边远地区的农业生产。

采用新指数以调整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的收入。用这些指

数来确定农产品价格,并使价格政策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

对在瑞典曾经广泛讨论过的农产品价格政策作出修改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两年的高通货膨胀率而引起的。一九七二年,通货膨胀率创造了百分之七点五的纪录,使某些食品(主要是乳制品和肉)的零售价格被冻结长达一年之久。当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取消物价冻结后,食品价格暴涨,引起了一场消费者的抗议运动。

虽然抗议是采取和平方式的,而且只限于在斯德哥尔摩的郊区,但政府的反应却是非常迅速。从一九七四年一月开始,政府对更多的主要食品,如牛奶、猪肉、牛肉、羊肉和马肉等,也实行了价格冻结。这次的物价冻结制止了主要食品的零售价格的上涨;否则,在一九七四年通货膨胀率超过百分之十的情况下,这些食品的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冻结了主要食品的零售价格,政府通过协商的办法,改变了农产品价格的补助形式。财政部长根据紧急控制物价法,拨出了约五亿美元的消费品补贴,其中大部分用于补助因受冻结零售价格影响的农场主。

这种做法,把税收负担从消费者身上转嫁到纳税人身上。在瑞典,这两者并不一定都是属于同一个经济集团的。除直接税外,国家的有些收入是,来自对奢侈品和耐用消费品所征收的间接税,因此,这种补助办法,只是对某些消费者的影响更大些。

这种直接付给农业生产者的消费品补贴,使食品零售价格水平成为“中等价格”的水平。在瑞典,历来是采取所谓“高价”政策来支持农产品价格的,把价格保持在高于世界的价格水平之上,并通过较高的零售价格,把增加价格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目前的这项补贴办法,能否作为一项永久的政策继续下去,在瑞典仍在讨论之中。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它将取决于国际和

国内的商品价格的发展前途。

目前这个明显地强调增加农作物产量的计划，同一九六七年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的基调相反。一九六七年的政策，提出了农业的自给率应降低到百分之八十的建议。

强调增加农业产量还有重要的政治原因。虽然瑞典的政党差别正在消失，但是，中央党却因发起了“绿色波浪”运动或“农场主是环境保护者”运动，而正处在得势的地位，它现在已成为瑞典的第二个大党，在国会中拥有九十个席位。而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同工人运动和消费者运动都有着强大的联系，也不得不重视农业，强调增加农业产量。

新农业计划将继续执行一九六七年计划中的某些政策，将继续鼓励那些在经济上有活力和有效率的企业，并对这些企业提供财政拨款和贷款，借以打击过份分散的经营。

根据新协定，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度内，用于维持价格的补助费用达一亿六千四百万美元，比过去增加了百分之八，这项费用专门用来补偿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七月间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的农场主。支持农业的全部费用（包括收入补助）总共为两亿一千万美元。受到这次零售价格冻结影响的商品，将得到国库拨款五亿美元的资助。

企业在重新强调增加农业产量。其中大部分同牛奶生产部门有关。由于牛奶生产在瑞典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度内，约占农业收入的三分之一），因此，同这个部门有关的政策是特别重要的。根据一九六七年的政策，牛奶产量之所以从一九六七年的六百五十万磅下降到一九七〇年的五百七十万磅，主要是由于占地五十英亩以下的牧场产量下降的缘故。

现行的农业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规定对那些经营有方、拥有十二头以下奶牛的小牧场主提供特别补助费。由于这种补助是根据牛奶的月交售量来补助的，小牧场主所得的数额最高，所以，这项计划是对小牧场主提高产量的一种刺激。

如果小牧场主每月交售一千一百磅到一万一千磅牛奶的话，那末，每一百磅牛奶就给以五十美分的补助。随着产量的增加，补助费就按比例递减，对每月生产超过二万四千磅牛奶的牧场主就不给予补助。例如，对每月交售一万一千零二磅到一万四千三百磅牛奶的牧场主，每月给予五十七美元的补助；而每月交售量为一万九千八百零二磅到两万零九百磅的，补助费约为二十三美元。

在一九七四年的价格计划中，政府采取了有利于促进牛奶和肉类生产的政策，希望通过这个政策使奶牛数量，从而使牛奶数量进一步得到显著地增长。由于小牛数量的增加和平均屠宰重量的提高，去年的牛肉产量稍有增加，在一九七四年，可望有实质性的增长。

从根本上说，瑞典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的目标，大概是继续对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的收入进行保护。这种农产品价格，可以使农场主因通货膨胀而获得补偿，并试图把农业收入提高到相当于其他部门的收入水平。

新政策强调扩大农场的规模，鼓励生产和试验适应北方气候的新种籽，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如果瑞典政府允许进口低价食品以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一个措施，那末，瑞典作为美国出口市场的重要性还在增加。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美国《国外农业》 上海青年宫国际时事讨论小组译）

# 农业机械化同生产和就业的关系

〔美〕 C·沃斯<sup>①</sup>

## 机械化是增加产量的关键

在苏丹,由于在棉田的备耕工作中使用了拖拉机,已经使棉花生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且使雨水地区能够大规模地种植高粱和其他作物。同样,在巴西南部,由于使用拖拉机和动力操作设备,使小麦、玉米和棉花已经可能大量增产。

人们始终没有认识到,机械化能够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在干旱的农业地区,拖拉机以及配套的耕作工具,不仅是清除杂草,而且是保持水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由于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农业机械设备和技术的发展,对于防止农田用水的流失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降雨量较少的地区,机械化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可利用的水源,有助于植物的栽培,从而增加了产量,并且还有可能改变作物的耕作方式,比如说,把两年一次休闲的轮作制,改变为三年一次休闲的轮作制。

拖拉机耕作的速度很快,这就创造了大量增产的可能性。土耳其经过十二年多的实验证明,在十月份播种的各类作物的收成,要比在十一月份播种的产量高百分之三十八。在赞比亚,如果在雨季开始之后迟一星期播种,就会使每公顷的玉米产量减

---

<sup>①</sup> 作者曾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工程机构的官员。

少六百七十公斤；花生产量减少五百六十公斤。肯尼亚进行的耕作试验证明，早种二十八天的玉米由于及时地赶上了下雨，产量要提高百分之五十四。机械化还创造了提早清除杂草的可能性，比迟除草的玉米要多百分之二十五的收成。据印度估计，要是延误农时，小麦迟播一天就会减产百分之一。旁遮普省的农民已经认识到，他们必须要有农业机械，才能进行连续种植三年或四年的周期轮作制。此外，如果他們要收获新的高产品种作物，也必须要有机械。由于技术的进步（机械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促使劳动生产率有很大提高，但它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的扩大，而不是对劳动力需求的缩减。在五年里，旁遮普省用小麦或现金支付的工资额增加了一倍的事实，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在泰国中部，如果在雨季以前用拖拉机犁田（在任何情况下，用水牛来做这种工作是太无力了），每公顷土地上的劳动力需要增加二十到三十个人工。

肯尼亚有个蒙维亚灌溉系统，在那里，机械化比较集中，并且使用拖拉机。不仅水稻的产量有了显著提高，而且证明它可以创造经济繁荣和就业的机会。这个具有高度生产能力的农业体系，也许成了肯尼亚吸收劳动力最多的农业企业，估计在每一千公顷土地上雇用了二千八百零七个就业者。

还有个典型的例子，能说明机械化增加产量和就业的情况，那就是阿富汗的现代化电力灌溉工程。这个工程由截断佩奇河的水流，增加水压而产生的电力，灌溉着七百五十公顷土地。仅仅花费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外汇，就把从前只能在很短的季节里放牧的两个村庄，改造成为可以种植双季作物的地方。这是其他有急流通过的肥沃流域可以仿效的典型例子。

## 机械化使劳动力更多地用于生产

在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上百万的农户根本用不着在家庭以外去雇用劳动力。对于他们来说，引进新的技术（包括机械化）会不会造成家庭劳动力的过剩呢？不会。当马来西亚的稻农购买了一辆两轮转式中耕机的时候；或者当有人用四轮拖拉机为他的种籽田备耕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失业。不管怎样，应该要看家庭的收入是否增加，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改善。机械化后，人们可以利用节约的时间，享受闲暇；还可以减轻妇女和儿童的农业劳动，给他们以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机会，更好地布置住房环境，并改进营养条件等等。或者，农民还可以把节余的劳动力用于饲养家禽或猪，从其他方面多增加一些收入。这就是亚洲国家引进双轮拖拉机后所发生的变化，农业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五。

一九五二年，在这些国家里，没有一辆双轮拖拉机，到一九七〇年，这些国家已有拖拉机两万八千台以上。在同时期内，每公顷耕地上吸收的农业劳动力，平均从两百零四人增加到两百四十三人。对于那些被雇用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他们已被整年地雇用了，在一年以内不用担心失业了。显然，以前每年只种一次水稻的时候，插秧和收获季节是劳动力最紧张的季节，而在这两次农忙之间，劳动力的需要量就较少。但是目前的精耕细作制度需要的劳动力比过去要大得多，从而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比过去要多得多。

菲律宾实行了水稻种植部分机械化以后，它在平整土地上所减少的劳动力，已经被除草、收割和脱粒等所增加的劳动需要量抵销了。

在大多数年代里，非洲的许多地区存在着季节性劳动力严重缺乏和许多工人又是长期失业的现象。这个特点在雨量仅仅允许种植单季作物的热带大草原上更是显著。在这些地方，完全的农村失业问题并不是严重的。此外，那儿的妇女劳动十分辛苦，她们既要负责栽培粮食作物，协助男人耕作，又要担负各种各样的家庭劳务。当男人们比较空闲的时候，妇女仍然在过度地操劳。所以，观察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不是看不充分就业或失业的程度，而是要看农业的全部劳动生产率的情况。技术改造的引进，最后将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量。

## 农业机械化的后果

农业机械化是以制造业（包括农业机具的装配、分配、保养和服务设备的建立）为先决条件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印度已经逐步地建立了，完备的拖拉机制造业，用以满足他们国内的需要。南朝鲜也制造出双轮拖拉机。另外，至少有八个发展中国家，即土耳其、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伊朗、埃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正从拖拉机装配的地方工业发展到在国内制造拖拉机。其他的一些国家在适当的时候也很可能赶上来。

还有，在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里，畜力牵引农具和拖拉机的配套农具的制造业，也已经完善地建立起来了。甚至在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里（特别是象塞内加尔和喀麦隆这样的国家），也有了这种农具制造业。它们不仅满足了本国的畜力牵引农具的需要，而且还向附近国家出口一些机具。

关于印度，它是第三世界中就业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伯格曼的报告说：“如果印度的农业机械制造业得到发展的话，其他许多工业（首先是钢、轮胎、石油、柴油机以及电气设备等工

业),都会受到影响而蓬勃地发展起来。一九七三年,印度大约花费了四千三百万美元生产新的拖拉机及其附件;大约花费了两千万美元生产拖拉机的备用部件;大约花费了二亿美元生产燃料和润滑剂等。这样,农业本身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工业品市场的合作者。这就说明农业机械化,已成了一个不能再被忽视的问题了。机械化将推动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交换。虽然长期地大量进口将对就业和技术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国内生产,将产生相当可观的连锁反应,会促进许多工业的发展,会增加新的工作和职业。”

巴基斯坦的就业问题也很严重。在那里,具有广阔基础的农业的发展,基本上要依靠建立一个发展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自觉地发展农业技术,就能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并将获得优厚的报酬。这就象自发的私人投资一样,在第二个计划时期,私人投资三千五百万美元制造和安装了两千五百个管井,这个投资对小型机械工业是一个重要的刺激。毫无疑问,这对于加速改进本国农具的生产,也提供了同样的机会。强调选择性的机械化,如上面谈到的管井建设情况,能促使本国的工业直接地为农业服务。

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间,拉丁美洲、近东、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的一部分(特别是北非),制造农具的许多中小型机械工业已经大规模地、不断地建立起来了。这将有助于当地的人民掌握必要的技术,以满足这些国家进一步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另外,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产量增加后,将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用于收获和脱粒等工作。如果使用拖拉机和耕作机械,种植了更多的高产作物,那末,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工作——收割、管理、贮藏、运输和加工。

这也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农业产量增加了,也就刺激郊区的

加工工业,如碾米、纺织及其他农业原料的加工工业的发展。这些郊区工业通常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应该鼓励这些加工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当郊区工业主要是为地方市场服务的时候,更是如此。

## 机械化和出口收益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是靠农业来赚取外汇,这就使它必须按照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价格生产那些出口的农作物。还有,在那些需要以自己生产的新产品代替进口产品的地方,新产品的价格必须不给消费者增加负担,新产品的生产必须不妨碍国内生产基本供应品的工业。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也必须实行机械化。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南美洲和苏丹),棉花的耕地操作除了收获以外,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泰国最近几年来增加了玉米的大量出口,要是没有拖拉机用于玉米田的备耕工作,这将是决不可能的事情。

为了对付各国竞争,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实力地位,也有必要在出口农作物收割以后实行机械化操作。L·埃斯安纽纳曾经指出,用机械烘干可可,要比用太阳晒干的优点多:干燥均匀,质量优良,劳动消耗少,干燥速度快,并能够按期地把农产品输送到中心仓库去。对于那些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谷物市场来说,销售操作的机械化也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如印度,尽管它有充沛的劳动力,但是从事于出口农产品的那些合作社建议,购买洋葱分类机,仍然是有利的。因为出口洋葱必须进行大量的精确的分类工作,这是要在短期内完成的最紧张的一种工作。困难就在于临时集中必要的劳动力,并使他们日以继夜地不停工作。以往的失败就在于无法按时完成分类工作并赶上船运时间,

以致丧失了进一步的定货机会。对于那些仍然依靠很强的体力劳动来发展农业的地方来说,在市场销售的关键时刻,实行机械化可能是重要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机械化获得和节省的外汇远远大于它的进口花费。从长远来看,由于增加了生产,机械化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多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

### 赞成机械化的其他因素

在许多国家里,社会学的力量直接地帮助了机械化。其中最有力的依据是,希望减轻人类在劳动中的痛苦和保持人类的威望。

大家都公认,仅仅用手工工具或用牲畜动力来种地,这种体力劳动是艰巨和痛苦的。特别在热带地区更是如此。在那里,农业工人是被人看不起的。

世界上有些地方,使用牲畜作为耕作的工具,确实为当地的农业带来了可观的利益,并且帮助他们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饲养牲畜需要有种饲料的土地,而在土地贫乏的地方,几乎抽不出饲料地。目前,埃及人口和土地的比例,特别明显地限制了在农业中广泛地使用畜力。在农业人口稠密的尼罗河三角洲,由于土地有限,饲料缺少,正被迫用发动机动力来代替牲畜动力。现在,农村合作社已经能用拖拉机从事耕作了,但个体农民仍然不能只饲养生产食品的奶牛,还要饲养提供动力的牵引牲畜,因为他们仍然必须牵着牲畜去转动水车,灌溉农田。如果要淘汰牲畜动力,就需要发展农村电气化,发展廉价的石油动力,发展柴油机传动水泵。因此,在那些地区,如果机械化的优点是全部实现的话,那末,农业上开始实现的机械化,必将在其他部分得到

完成。

## 结 论

不管我们对机械化的好处如何评论，农业机械化将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里继续加速发展。它必须在小农业中间得到推广，正如它在大农业中得到推广一样。以往农业机械化曾经遭到失败的原因是，设备粗劣，维修力量薄弱，缺乏训练和推广以及缺乏适当的管理等。当前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如何使小农业增产。如果要使世界粮食得到满足的话，在今后二十年内，这是要注意解决的问题之一。政府的拖拉机站和合作社的机械联营组织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它本身已被证明是机器的墓地了，这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但是必须找出问题的答案。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对发展中国家合理的农业机械化持建设性的态度。这样的机械化能够减轻农业中的一些繁重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收入，对全面的就业作出有重大价值的贡献，还能够从农产品的出口中增加外汇收入。

（摘自一九七四年一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经济和统计月报》 杨建文译）

# 农业教育

〔日〕厚泽留次郎

农业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培养农业自营者或是农业技术人员的专门教育；一种是为着形成人们所必需的教育而实施的普通教育。前者是职业教育，后者是普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农业教育，从前期中等教育直至高等教育，都是进行的。作为普通教育的农业教育，只在前期中等教育阶段里实施。

在英、法、德等国，作为职业教育的农业教育属农业部管辖，作为普通教育的农业教育属教育部管辖。在美、日等国，原则上属教育部（文部省）管辖。以往，农业教育属农业部管辖的国家极多，现代的倾向是，就业前教育全归教育部管，在职教育分别由所属部门管辖。

美国 一八六二年，根据莫里尔建议作出的土地拨款法案，在各州设州立农业和机械大学，以后开始设立高等农业教育机关。一八八七年，根据哈奇法案，在州立农业和机械大学里附设农业试验场。一九一四年的史密斯-利弗法案规定，农业普及事业由大学负责。因此，美国的州立农业和机械大学是三位一体的，担负着州内的农业教育和农民教育。

中等农业教育机关，最初于一八二一年在缅因州加吉那镇开设，一九一七年制订史密斯-休士法案，中等职业教育开始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因此非常充实。综合高级中学开设农业科，独立的农业学校极少。一个学年的学生数也很少，四年制高级

中学里平均有一百名左右。因而，农业教师也很少。以课堂教学、农事工作与指导未来美国农民家庭的计划为主。

此外，还有青年农民班和成年农民班的社会教育。

英国 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多少有些不同。

1. 农业补习教育，对修完义务教育从事于农业者，施以一至三年的定时制教育；2. 农业讲习所，是继补习教育以后的农业教育机关，全日制一年；3. 农业专门学校，入学条件是在学校就读十二年，实际经验一年，培养目标是农业经营者、农业推广员和农业教员。两年的全日制；4. 此外，有大学、学院的农业系的高等教育机关。

法国 一九五九年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其后多少有些变动。与此相应，一九六〇年公布《关于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训练的法律》，企图改善农业教育，制订了适当部署农业学校和有计划地培养必要人员的十年规划。农业教育机关中有农业补习学校、农村家政补习学校（定时制）、农业高级中学（全日制三年）、农业专修学校（全日制一至三年）、农业高等专门学校（全日制二至四年）、私立的大学农学系等等。

西德 西德的农业教育，大致可分为农业训练和农业教育两种。义务教育八年毕业后，拥有三年实际经验者可以上定时制农业补习学校。这种学校毕业后即为艺徒。其间，上两个冬季的农业冬季学校，以后到二十五岁左右满师。上这种课程的农民占整个农民数的百分之八十。此外，还有农业学校（全日制三年）、高等农业学校（全日制一年）、农业专门学校（全日制三年）、综合大学的农学系、兽医系等。

苏联 义务教育八年毕业后，希望当农业技术人员的人，可以上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全日制一至二年），想当农业中级专门人员的人，可以上农业中等专门学校（全日制、定时制、函授制，

修业年限四至五年)。不过,对前一种学校的毕业生,也敞开了上后一种学校的大门。此外,作为高等教育,在综合大学里设有农学系。

(摘译自日本平塚益德主编的《世界教育词典》一九七二年版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

---

(上接第 144 页)

语言之一,分布在印度东部,包括加尔各答市,使用人数共约七千万。

十二、葡萄牙语。

使用人数约六千万。使用葡萄牙语的国家主要有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以及其他原葡属非洲殖民地。西班牙西北部约三十万人使用葡语。

十三、意大利语。

使用人数五千多万。使用意语的国家有意大利、圣马力诺、梵蒂冈、瑞士。非洲原意属殖民地也通用。

(王德春)

## 克格勃<sup>①</sup>的秘密活动

〔美〕约翰·巴伦

### 铁门后的秘密

一九五二年秋，美国军士罗伯特·李·约翰逊在西柏林当美军文书。他受到同僚的倾轧，得不到提拔，因而怀恨在心，决定投靠苏联以进行报复。一九五三年二月，他潜入东柏林，受到了苏联“克格勃”的接待。“克格勃”听了他投奔的理由，认为约翰逊经历平凡，对间谍活动的用处不大，但仍发展了他，也许有朝一日可以利用呢！俄国人在东柏林对他进行了训练。约翰逊回到西柏林后，在“克格勃”派遣特务保拉（基利伏雪的化名）指导下，钻进了柏林美军总部情报处任文书。他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开始偷摄文件。他劲头十足地向“克格勃”提供了一大堆文件影印本。但保拉批评他说：“我们要的是密件，不要这些废物。”

约翰逊在失望之余，想洗手不干了。“克格勃”对他也若即若离。后来，约翰逊在法国谋到职务，在陆军中任会计，更是一筹莫展。“克格勃”仍定期同他会见，要他耐心等待机会。接头人是维克多。

约翰逊老婆病了，在巴黎治疗。出于对老婆的照顾，约翰逊要求调往巴黎工作。有人对他说：“假定你要调往巴黎，不妨向

---

① 即苏联特务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译者

位于奥雷机场的军事文件交换中心申请。”

约翰逊问：“这是什么机构？”

“传送秘密文件的。那里警卫森严，常有缺额。”

军事文件交换中心座落在机场远处，所有华盛顿送给北约组织、美军作战指挥部以及地中海的第六舰队的重要文件、密码和密写资料首先集中带到这里，然后分发。欧洲来的绝密文件也在这里转交。这里事实上是美国军事机密的欧洲堡垒。

军事机构设计了一整套安全措施，使这座水泥建筑无法突破。前面是个办公室，文件在那里收发。后面是一间大的铁文件库，要通过两道铁门才能进入库内。第一道铁门由金属门闩关上，门闩两头上了锁。第二道铁门的钥匙锁更为复杂。

因而，谁想进入库内，不掌握第一道门两把锁的数字组合状况和第二道门的钥匙是无法可想的。从来也不准任何人单独进入库内。制度规定，在开门时必须有一个军官在场。此外，一年四季，日夜均有守卫站岗。看来是很保险的了。

没有多大的困难，约翰逊就当上了守卫。在他向维克多汇报时，维克多拍着他的肩膀说：“太好了！”顷刻之间，八年前被“克格勃”认为无用的人，突然成为非常可贵的人物了。

维克多从此加紧同约翰逊联系，他向约翰逊转达了莫斯科“克格勃”总部的指令：“第一步，你应该争取在办公室内分发文件。”

约翰逊回答：“做到这点，是需要通过审查的。”

维克多说：“想办法试试看。”

根据美军驻在法国领土的协议规定，美军不准向法国居民调查情况。军事当局通过粗略审查，未发现约翰逊有什么可疑。于是，约翰逊在一九六一年当上了文书。约翰逊在分发文件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秘密代号，虽然他不懂，但“克格勃”知道这些

代号是表示北约组织的军事实力和核打击计划。

维克多担心办公室内可能藏有秘密警报装置，防止规定时间外打开文件库的铁门。他对约翰逊说：“你要仔细检查有没有这种装置？”

约翰逊在俄国人授意下，自愿要求帮助粉刷办公室，结果，未发现有警报装置。

最后需要突破的是三把锁。维克多给了他一包橡皮泥，要约翰逊经常带在身边，伺机偷取钥匙，用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把钥匙刻在橡皮泥上。

一九六二年的一个早晨，带班的中尉感到不适。他要约翰逊即刻离开文件库，自己关上铁门冲到外面去呕吐，匆忙中忘了拔出钥匙。这是一个好机会，约翰逊赶快拔出钥匙，把它印在橡皮泥上。后来，维克多说刻得太浅了，没有用，希望约翰逊再作一次努力。

一天，约翰逊指着文件库内的一个铁盒问带班军官：“这里面是什么？”

“没有什么，里面是空的。”军官边说边打开铁盒。

约翰逊看到角落里有一把备用钥匙。他乘机偷偷地放入口袋，晚上做了三个刻印。第二天，把钥匙归入盒里。三星期后，维克多交给他一把莫斯科配制的钥匙，并说：“解决了一个问题，但还有两个。”

约翰逊设法站在军官的背后，看他拨弄带有数字组合机关的锁，想默记数字组合。军官斥责他：“站开，不要躲在背后看我拨弄这东西。”维克多非常担心这次意外事故，他告诫约翰逊：“往后你要站得远些，表示不感兴趣。”

制度规定，军事当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要改变一把锁的数字组合。刚休假回来的军官向轮休的军官在电话上查询新的数

字组合。他记在一张纸上，后来又不在意地把纸抛进废纸篓。

以后，约翰逊把纸拾起来，交给维克多。维克多非常高兴地说：“你应争取周末当班，试试是不是对。”

办公人员在夜里和周末须轮流值班，唯有此时是一人在场。“克格勃”认为周末是行动的好机会，那里的人都不愿周末值班，约翰逊很容易地取得许可。他利用第一晚值班机会，试了一下数字组合，喀嚓一声，那把锁开了。

“我们的专家有办法找出第二把锁的数字组合机关的，”维克多说，“需从各个角度把锁摄影下来。”他交给约翰逊一只微型照相机。

约翰逊的工作对“克格勃”是如此重要，“克格勃”总部全力以赴，调动了莫斯科和巴黎的力量以确保成功。莫斯科派来菲立克斯·阿历山得罗维奇·伊凡诺夫协助维克多。他有时扮演外交官，有时出席联合国活动。

经维克多介绍，菲立克斯在一家酒店向约翰逊面授机宜。他说：“莫斯科将送来特殊工具。”边说边打开一张纸，上面绘制了工具的图样。

“这是微型X光机”，菲立克斯解释，“贴在锁上它会自动透视的。专家们看了透视照片就能算出数字组合机关。”

不久，菲立克斯拿来工具，并面授使用方法。

星期日上午三时，约翰逊在现场如法炮制。三星期后，菲立克斯塞给约翰逊一张写有数字的纸条，喜形于色地说：“这就是了。”

约翰逊问道：“你怎么知道一定对的呢？”

“我们知道这是毫无疑问的”，菲立克斯微笑地说。“行动时间决定在十二月十五日。”

当晚，菲立克斯把约翰逊带到离奥雷机场不远的公路转

弯处。

“零时十五分我在这里等你。”他说，“你乘汽车来时，我会向你招手的，看起来好象我在向你求援。你停车把文件交给我！估计你离开值班岗位只要五分钟。”

交待了这接头地点后，菲立克斯又驾车把约翰逊带到五英里外的一个墓地说：“三点十五分我把文件在这里交还给你。”

菲立克斯从汽车里拿出两个相同的航空包，给了约翰逊一个。他说，“把文件放在这包内。你给我时，我给你另一个。看看里面是什么。”

包内有一瓶酒、四块三明治（面包夹肉）、一只苹果和四粒药片。

菲立克斯解释：酒、肉是加了迷药的，食后会很快睡去。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约会间隔时间内有人闯来，给他喝点酒，这样你就能安全地跑出来收回文件。如果需要你陪饮，先吞两粒药片，隔五分钟再吞两粒，迷药对你就不起作用了。”

每天晚上都作预演。后来，菲立克斯又把约翰逊带到一处地方。在一棵大树底下，菲立克斯拾起一块大石头，慢慢旋开，里面露出了一些东西。“遇到紧急情况，在这里面你可以找到一张加拿大的护照，贴有你的照片，还有联络方法和钱。”菲立克斯说，“到布鲁塞尔去，那里会有人接应你的。”

菲立克斯一再交待，逃跑计划应自动生效，除非约翰逊在每次作案后发出安全讯号：星期日早晨下班回家途中在路过的电话亭旁丢下一只“红圈”牌香烟壳子，里面用铅笔划“X”。

最后一次演习选在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晚上，菲立克斯说：“我在这里等你，很多人在期望着，祝你好运。”

星期六晚上，约翰逊在值班时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按广播时间校对手表。二十四英里外在巴黎的菲立克斯也在对表。驻巴

黎的苏联使馆内，有一伙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专家等待着。他们知道时间紧迫，一定要在一小时内打开文件袋的密封条，把内容拍下来，并重新加封而不露痕迹。

约翰逊用不着两分钟打开了三把锁，把文件袋塞进航空包，匆匆赶去会见菲立克斯。一切象预演那样顺利。早上三时十五分，他赶到墓地拿回文件袋放入库内。星期日早上约翰逊回家时，一批美国秘密军事情报已在送往莫斯科途中。

约翰逊连续干了两次，毫无困难。圣诞节后，菲立克斯欢天喜地向约翰逊祝贺：“我代表苏联部长会议对你为和平作出的贡献表示祝贺。你拿来的材料是如此有用，连赫鲁晓夫也看了。为了表示赞赏，奖给你红军上校的军衔，还有二千美元。”

据尤利·伊凡诺维奇·诺申科（“克格勃”少校，后来逃往美国）透露，偷摄的文件中有些机密涉及到美国在欧洲储存的核弹头数量和地点。

这些机密暴露了美国在欧洲的防御计划。它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使苏联了如指掌。

收获如此巨大，苏联视为至宝。为保证万无一失，诺申科说，后来的盗窃活动直接受政治局指挥。

菲立克斯就是这样指示约翰逊的。他规定，今后要相隔四到六个星期作案一次，十四天前进行策划。“莫斯科要有人来，”菲立克斯说，“安排起来是很复杂的。”

专家们不能长期留在巴黎。“克格勃”担心法国情报机构会发现他们，察觉出他们的意图。所以要减少他们往来的次数，而且分散地从各地来到巴黎。

约翰逊虽已两次成功，但还是冒了风险。假定有人发现他两次不在岗位上，他是没法解释的。俄国人不会给他编造遁词，因为这毫无用处。何况，约翰逊只是由于目前所处地位才有价

值，“克格勃”对他个人是不稀罕的。“克格勃”知道，约翰逊如受严厉审讯，他必然会和盘托出。

作案后的一个星期日中午，约翰逊走出宿舍去买面包，看到菲立克斯和维克多的汽车停在宿舍附近，使他惊异。两人看到他后即刻驾车离开，约翰逊醒悟地想起：忘了发出安全信号。

“你的疏忽不知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菲立克斯愤怒地在作案后的例行碰头时说：“为了布置你逃跑，我们要从巴黎到莫斯科惊动很多人。现在要另写报告了。”

“很抱歉，”约翰逊回答，“我忘了。”

“下次不能这样。”菲立克斯警告，“这种疏忽会使你坐牢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约翰逊第七次作案，照指定时间把两个文件袋交给了菲立克斯。但在约定的三点十分，约翰逊没有在墓地露面。

菲立克斯焦急地等待着，越想越担心，也许约翰逊出了事，美国人会来追捕他的。早上五时，他不能再等了，拂晓后没有机会送还文件。菲立克斯铤而走险，驾车去奥雷机场的交换中心，把文件袋抛进约翰逊的汽车前座。离开时不晓得他的果断行动能否挽救灾难，他想希望是不大的。

然而，事情并不坏。约翰逊睡着了。五点三十分他醒来发疯似地冲向汽车。航空包就在那里。刚关好库门，接班的下士已到达。

约翰逊自知失误，编造了理由想蒙混过去。“克格勃”知道约翰逊在撒谎，但不了解什么原因。在未查明原因前，要对约翰逊进一步考察，因此暂停活动。

后来，由于约翰逊的老婆告发，终于暴露了这个阴谋活动。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评论指出：“我们的损失是重大的，有些损失无法估量，也无法弥补，不是以多少美元能计算出来的。”

最根本的问题是假定发生战争，我们将受到致命打击。”

## 弄虚作假

一九六九年八月，驻美国的苏联使馆二等秘书鲍里斯·达维多夫（“克格勃”军官）邀请美国一位中苏问题专家午餐。明知不能拉他入伙，但仍希保持接触，想利用他向国务院通风报信，甚至把消息转达给总统本人。

午餐时，达维多夫谈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表示：“事态非常严重，我政府可能被迫采取强硬行动。”

“你想的是怎么样的行动？”美国专家问，“一次突然袭击吗？”

达维多夫从容回答：“是的，一次先发制人的袭击正在酝酿，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然后提出问题刺探：“假定我们作出这种打击，美国政府抱什么态度？”

美国专家正如“克格勃”所希望的那样，立即向白宫汇报。尼克松总统作了分析。他们认为，如表态不干预，只能加强苏联内部一些人的地位而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反之，克里姆林宫中的另一些人又会认为是对改善西方关系的威胁；任何一种表态都会被中国认为是苏美勾结对付中国的证据。尼克松最后下令不睬。

“克格勃”常伪造文件，这是他们混淆视听的惯用手法。“克格勃”收集世界各地的知名人士签名式样，各种文件格式（包括私人的和政府用的）。它们还得到卫星国情报机构的协助，如捷克情报机构“STB”观察到西方国家在收到圣诞贺片后，礼尚往来一定要回寄的，因此，捷克使馆就向各地的政府官员、知名人士分送精致圣诞贺片。他们把交换来的带有签名的圣诞贺片收

藏在布拉格，供需要时使用，还提供给“克格勃”。

一九七〇年，塞浦路斯共产党向苏联使馆汇报，希腊军事人员在策划推翻塞浦路斯政府的政变。“克格勃”作了调查，向总部报告，这个情况不确实。总部受到此事启发，在三月间一个晚上，驻安卡拉的苏联大使瓦西里·弗列德罗维奇·格鲁比亚科夫（“克格勃”老手）要求土耳其外交部紧急接见，指出希腊叛变集团得到美国和北约军队支持，正在酝酿发动政变。

受惊的土耳其政府在次日早上宣布了希腊的阴谋活动。“克格勃”的宣传工具为土耳其报纸提供了资料。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俄国人却断言他及时揭发了这次阴谋，挽救了塞浦路斯。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美国《读者文摘》出版社出版的  
《克格勃——苏联特务人员的秘密活动》一书 洪  
茂斌译）

## 世界的语言及其使用情况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例如，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同操英语，但它们毕竟不是一个民族。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和统计，现在全世界约有两千七百九十多种语言。

按语言亲属关系的远近，世界上的语言可以分为不同的语系、语族、语支。现简介如下：

### 一、汉 藏 语 系

#### 一、汉泰语族

1. 汉语。
2. 越南语。越南京族的语言，一说属汉藏语系的独立一族。
3. 泰语。
4. 壮语。

#### 二、藏缅语族

1. 藏语。
2. 缅甸语。
3. 哈尼语。
4. 景颇语。

#### 三、苗瑶语族

1. 苗语。
2. 瑶语。

## 二、印欧语系

### 一、印度语族

1. 印度斯坦语。有两种标准语：①印地语。②乌尔都语。
2. 孟加拉语。
3. 旁遮普语。
4. 僧加罗语。斯里兰卡的国语，约五百万人使用。
5. 梵语。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使用的古语言，有丰富文献，对印度语族各现代语言有很大影响。
6. 昆哈利语。

### 二、伊朗语族

1. 波斯语。伊朗的国语，中东许多伊斯兰教徒的第二语言。
2. 阿富汗语，即普什图语。
3. 塔吉克语。

### 三、斯拉夫语族

#### 1. 东部语支

①俄语。②乌克兰语。使用人数约四千万。③白俄罗斯语。

#### 2. 南部语支

①保加利亚语。使用人数约七百万人。②塞尔维亚—霍尔瓦特语。南斯拉夫有一千多万人使用。③斯洛文语。④马其顿语。⑤古斯拉夫语。

#### 3. 西部语支

①捷克语。九百万人使用。②斯洛伐克语。③波兰语。两千七百万人使用。

### 四、波罗的语族

1. 立陶宛语。
2. 拉脱维亚语。
3. 古普鲁士语。

### 五、日耳曼语族

#### 1. 西部语支

①英语。②荷兰语。约八百万人使用。③德语。

#### 2. 北部语支

①丹麦语。②瑞典语。③挪威语。④冰岛语。

### 六、罗马语族

#### 1. 法语。

#### 2. 西班牙语。

#### 3. 葡萄牙语。

#### 4. 意大利语。

#### 5. 罗马尼亚语。使用人数一千三百多万。

#### 6. 古拉丁语。现作为天主教会的语言。

### 七、凯尔特语族

#### 1. 爱尔兰语。

#### 2. 苏格兰语。

### 八、希腊语族

#### 1. 希腊语。使用人数七百多万。

#### 2. 古希腊语。

### 九、阿尔巴尼亚语族

阿尔巴尼亚语。

### 十、阿尔明尼亚语族

阿尔明尼亚语。

## 三、闪含语系

#### 一、阿拉伯语。

#### 二、阿姆哈尔语。埃塞俄比亚的国语。

## 四、高加索语系

#### 一、阿布哈兹语。

#### 二、格鲁吉亚语。

## 五、芬兰-乌戈尔语系

### 一、芬兰语族

1. 芬兰语。
2. 爱沙尼亚语。

### 二、乌戈尔语族

匈牙利语。

## 六、突厥语系

### 一、土耳其语。

### 二、哈萨克语。

### 三、维吾尔语。

## 七、蒙古语系

一、喀尔喀-蒙古语。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

二、布利亚特-蒙古语。中国内蒙呼纳盟，苏联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

## 八、马来亚-玻里内西亚语系

### 一、印尼语。

### 二、马来语。

### 三、爪哇语。

## 九、班图语系

一、斯瓦希里语。使用人数约八百万人。

## 十、美洲印第安语系

包括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语言二百多种。

## 十一、几种系属不明的远东语言

一、日语。

二、朝鲜语。使用人数约三千万。

在世界上两千多种语言中，有些语言使用人数很少，如美洲印第安人的两百多种语言中，有的只有几百人甚至几十人使用。又如苏联境内有一百三十多种语言，其中远东地区的纳奈语，使用人数只有一万五千多人。另外一些语言的使用人数则很多，其中超过五千万人的有十三种：1.汉语，2.英语，3.法语，4.俄语，5.西班牙语，6.阿拉伯语，7.印度斯坦语，8.日语，9.印尼语，10.德语，11.孟加拉语，12.葡萄牙语，13.意大利语。其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为联合国大会及其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阿拉伯语为联合国大会及其各主要委员会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现把这十三种语言的情况简介如下：

一、汉语。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使用人数有七亿之多，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在东南亚各国，有一千万华侨和华裔使用汉语。

二、英语。使用人数有两亿多，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

使用英语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喀麦隆、斐济等。由于地域不同，英语在英国和美国有所分化，出现了一些差异。如语音方面，美国发音中只要单词中有r字母就发[r]音，而在英国发音中，[r]音只出现在元音前，等等。但因交往频繁，广播、报刊、书籍等广泛交流，差别还不很显著，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没有重大改变，所以还没有分化为独立的语言。

除上述国家外，英语在利比亚、埃塞俄比亚、缅甸、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芬兰、瑞典等国家和地区也通用。

三、法语。使用人数近六千万，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

使用法语的国家有法国、加拿大(和英语并用)、卢森堡、海地、刚果、塞内加尔、马里、扎伊尔、几内亚等，在比利时法语同弗来米语并用，在瑞士法

语同德语、意大利语并用。通用法语的国家还有老挝、柬埔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一些原法属殖民地等。

四、俄语。俄语是苏联的主要语言，使用人数有一亿多，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

除苏联外，通用俄语的国家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等。

五、西班牙语。使用人数约九千万，是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

使用西语的国家有西班牙、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多米尼加、波多黎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阿根廷、乌拉圭等。在葡萄牙、菲律宾和非洲原西属殖民地等地也通用西班牙语。

六、阿拉伯语。使用人数约五千万，是联合国大会及其各主要委员会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

使用阿拉伯语的国家有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也门、埃及、叙利亚、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索马里等，此外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也通用阿拉伯语。

七、印度斯坦语。使用人数近两亿。有两种标准语，用当地天城体字母书写的是印度的国语印地语，多借用梵语词；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是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语，多借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

八、日语。使用人数约一亿。

日语除日本本土外，使用的地区还有琉球群岛。另外，夏威夷、巴西各有数十万人使用。

九、印尼语。印尼语是印度尼西亚的国语，在苏门答腊东部的马来语的基础上形成，使用人数约九千万。

十、德语。使用人数约九千万。

使用德语的国家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瑞士。另外，荷兰、卢森堡也通用。

十一、孟加拉语。孟加拉语是孟加拉的国语，印度的十四种官方区域

(下转第 129 页)

## 康托罗维奇

苏联的康托罗维奇和美国的库普曼，是一九七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获得者。

康托罗维奇究竟是何许人？

列昂尼德·B·康托罗维奇，列宁格勒人，出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一九三〇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九年间在列宁格勒工业建筑工程学院任教，一九三二年后又在列宁格勒大学兼职。一九三五年取得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一九五八年，苏联科学院选他为经济学方面的通讯院士，被派任为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数学研究所数理经济方法试验室的负责人。一九六五年，他因在经济数学方面的“贡献”而被授予“列宁奖金”。一九七五年十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近年来，康托罗维奇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工作。

还在三十年代，康托罗维奇就以一个数学家的身份，开始研究“如何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起先，研究只涉及到一个企业范围内的技术经济问题。事情是由列宁格勒的一家胶合板托拉斯的要求引起的，这家胶合板托拉斯拥有各种类型的机器，由于加工的圆木体积不同，每一台机器的生产效率很不一样。于是，该托拉斯请求列宁格勒大学数学力学研究所帮助解决如何使每台机器都获得最高生产能力。康托罗维奇应用求极值的方法，即线性规划的办法，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后，康

托罗维奇企图把数学方法运用于解决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一九四一年左右，他写成了关于《资源的最优利用》的专题论文，先后在列宁格勒工艺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作了报告。

康托罗维奇的理论，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风行一时的“计量经济学”是一路货。三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危机的年代，现实宣告了以往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理论的破产。于是，“计量经济学”就应运而生；它的数学演绎的“科学性”既被宣布为繁荣经济的良方，它的繁复计算又成了掩盖资本残酷剥削劳动的手段。但是，在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苏联，康托罗维奇的那套“理论”则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资产阶级“计量经济学”变成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迫切需要的“新技术”。原苏联科学院经济、哲学和法学学部秘书瓦·涅姆钦诺夫说：“我们不要逃避，更不要害怕‘计量经济学’这个名词，而是要正确地理解它，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正确地运用它”，“把它变为科学，即计划计量学”。在这样的气候下，康托罗维奇很快走运了。他在一九四一年一再宣传而不被人们重视的研究成果，也被当作瑰宝而重新发掘出来，并在一九五七年的苏联《科学院报告》中，以《论计划——生产任务的某些极值曲线的分析方法》为题加以发表，康托罗维奇本人也因此而身价倍增。一九五八年，他被苏联科学院选为经济学方面的通讯院士，同时被派任为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数学研究所数理经济方法试验室的负责人。这个试验室的任务，据康托罗维奇的说法，“就是进一步发展解决经济任务的数学方法，并在西伯利亚广泛推广运用这些方法”。从此，康托罗维奇也就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于苏联经济论坛上。一九五九年，他在苏联科学院召开的“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与科学任务”的讨论会上，对过去的经济学界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

说：“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四十二年了，而我们的经济科学还不能清楚地了解，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意义以及怎样运用这一规律，既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地租，也不知道基建投资效果的一般算法。”他竭力主张改革苏联的经济理论。同年，他的主要著作《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一书也由苏联科学院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把最大盈利原则作为资源最优利用的基本准则。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所谓“客观制约估价”的新范畴。他认为“客观制约估价”是计算社会耗费的工具，是价格的代用品，可以作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方法。这个“客观制约估价”包括哪些方面呢？他说，“客观制约估价”包括：各种专业和熟练程度的劳动的估价，各种原材料、电力及其稀缺性的估价，设备的“客观制约估价”，自然资源的地租，等等。并随着决定它的各种因素的稀缺或多余程度的不同而提高或降低，有限的资源得到较高的估价，多余的资源得到零的估价。不难看出，康托罗维奇的《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是以最大盈利为准则，以资源的有限性为基础，以供求关系的分析为其出发点的，是资产阶级的“边际效用论”的翻版。一九六〇年一月，在《论生产耗费的计算》一文中，同年四月在苏联科学院召开的关于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的科学会议上，康托罗维奇继续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

由于康托罗维奇的修正主义“新理论”过分露骨，在苏联也曾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说他是“把最大限度利润奉为计划工作的原则”；他的“客观制约估价”是“企图把不可调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同‘边际效用论’的变种的边际的估价体系结合起来”；“是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直接相违背，同计划经济的规律性相矛盾”的；等等。为此，康托罗维奇及其支持者又竭力进行申辩，说什么“边际计算不等于边际理

论”，而且攻击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是“拒绝在国民经济范围内运用数学方法的表现”。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当然是支持康托罗维奇的“创新”的，对于比利别尔曼“建议”的出笼还要早的康托罗维奇的“新理论”，他们当然欣赏。因此，康托罗维奇可以不断地利用各种场合，包括他所主持的一个不定期刊物《最优的计划设计》，拼命鼓吹他的观点。一九六四年三月，苏联的《苏联》杂志（为美国出版的刊物）、《经济问题》杂志和《经济报》为讨论在计划工作中应用控制论和数学方法的问题，联合召开了经济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的“圆桌会议”。在这次会上，康托罗维奇不仅坚持了自己的主张，特别“强调”在价格形成中要注意这样一些事实：“产品的基金占用量、自然资源的利用（地租成分）、生产的可能性和需要的比例”，而且进一步提出，为着在数学方法基础上实现最优计划，“要求在经济、经济指标、物质刺激方面作重大改变”。难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说，康托罗维奇是“激进的改革者”。康托罗维奇竭力发动苏联的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为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实践效劳，因而获得了苏修当局的重赏：一九六四年，他又被选为数学方面的院士。这样，康托罗维奇既是经济学通讯院士，又是数学方面的院士。这样的身份在苏联的“专家”中也很少见。一九六五年，他又因为在经济数学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列宁奖金”。近年来，苏修当局又调他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工作。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他和 A·B·科尔斯特科合写的《经济中最有利的解决方法》一书。

（景池）